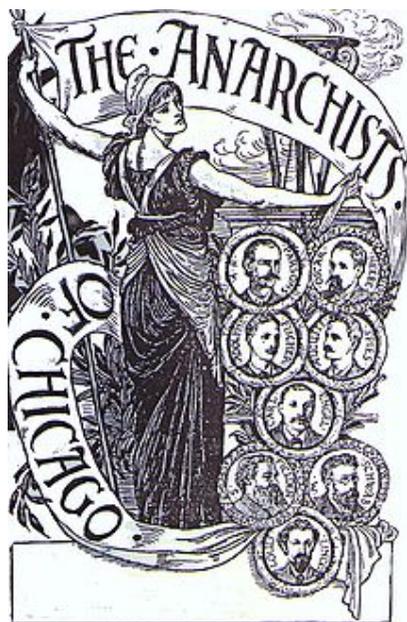


芝加哥干草市场的殉道者

The Chicago Haymarket Anarchists

芝加哥干草市场的殉道者

The Chicago Haymarket Anarchists



安那祺主义文库 A-3

ISBN 978-0-557-24143-9 90000



 中日美 比較政策研究所
日米中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SBN 国际书号: 978-0-557-24143-9

Publisher & Printer 出版印刷社: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stown, NC 27560, USA

Distribution 发行: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160 Maidenhair Ct., San Ramon, CA 94582 USA

Language 语言: Chinese 中文

Editor 编辑: Jing Zhao 赵京, zhao@h-china.org

Edition 版本: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Date 日期: November 28, 2012 2012年11月28日

安那祺主义文库 编辑出版发行 序言

自从 1989 年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使我在日本转变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以来，我开始从日文和英文系统阅读安那祺主义的丰富历史和理论。1992-95 年我们就职于日本公司期间，居住在富士山下绮丽的伊豆半岛，在沼津市图书馆读到“黑色战线”编辑的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印象深刻。后来我知道“黑色战线”其实主要是一个人的工作时，更加肃然起敬。当我得到巴金的译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巴金译文全集》共 10 卷电子版），读到巴金早已翻译成中文的部分“黑色战线”史料，有许多是我想翻译、介绍的思想。可悲的是，许久以来，在中国能够出版的带有思想性的经典书刊，包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刻影响我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几乎都被加上无知、愚昧或无耻的政治按语。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只是“供批判用”，才“有价值”在中国出版。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巴金全集》没有收入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祺主义》（1930 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等；而在收入的“我的幼年”一文中，把陈独秀的名字删去，把关于爱玛·古尔德曼（作者的“精神母亲”）的一段完全删掉了。巴金的文学译作价值较高，有些政治编译不免简单、粗糙、过时。这些都促使我编辑这套《安那祺主义文库》。自孔子以来，编辑史籍，也是为了开拓历史。

除了我的文章，本文库收集的一些史料来自网上。安那祺主义反对一切“所有权”，著者、译者（包括我本人）都把自己的写作作为对人类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版权”的概念，本文库也主要通过网上免费发行。不过，如果谁有疑问，我也欣然愿意修改。文库大致按地域（语言）和时间次序分类。A-北美、C-中国、F-法国、G-德国、I-意大利、J-日本、R-俄罗斯、S-西班牙、W-其他。文库中“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和“安那祺主义”通用。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2011 年 11 月 11 日

目 录

1. 《芝加哥干草市场殉道者》前言后语（赵京）
2. 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悲剧记事（林佳和）
3. 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国际五一劳动节的历史（阿卫）
4.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司法冤案（宋冰）
5. 自由血（巴金）

《芝加哥干草市场殉道者》前言后语

本书第一版以《芝加哥的殉道者》为名，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第21卷第55-122页《自由血》。巴金是1927年为了纪念干草市场的八名安那祺主义者殉道·受刑40周年而编译的，从中可以感受到爱玛·古尔德曼等安那祺主义者在殉道·受刑者那里得到的精神激励，是很好的历史介绍和思想启蒙作品，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激动人心。[据李存光先生整理的《佚简新编》可知，1948年7月开始，甚至直到1950年9月，巴金一直与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通信，在信中，他称他们为“Dear comrades”，向他们索取或与之交换无政府运动材料及文学作品。例如他向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Labadie收藏室负责人Agnes Inglis索取(寄送)无政府主义者Sacco(萨柯)和Vanzetti(凡宰特)的材料、Kropotkin(克鲁泡特金)的材料，尤其多次搜求芝加哥Haymarket Affairs(干草市场事件)中无政府主义殉难者的资料，并且对其中的A. Spies和他的妻子Nina Spies表现出浓厚兴趣。在1950年9月18日的信中，他声称“我尚未放弃写一部有关Nina Spies的书的打算，不过我将推迟这一计划”，但没有说明推迟的原因。]¹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客观条件都不容许巴金再回到干草市场的悲剧历史了。

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中国被立为国家节日，却被有意掩盖了其来自干草市场悲剧的安那祺主义历史²，巴金1927年的编译成为中国大陆对干草市场悲剧社会意义的唯一介绍。幸运的是，近年来，随着巴金研究的兴旺和深入，加上(反)全球化社会运动的进展，至少在互联网上出现了某种程度“无政府主义的复兴”，今年在中国的网站上还出现了从司法角度批判美国制度而介绍干草市场审判过程的文章

¹ 胡景敏：“巴金：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论1949年后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48d76e0100caia.html

² 现在情况略微改善，从网上搜索“五·一节”的条目，也提到干草市场和无政府主义，但强调是“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二国际”制定了这个节日，无视安那祺主义者为之殉道的使命本身就反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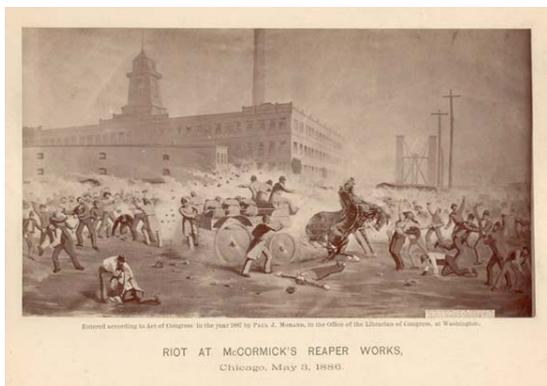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司法冤案”（宋冰）。另一方面，台湾的劳动团体、劳工法学者没有无视干草市场，翻译介绍过这段历史。本书第二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改名《芝加哥干草市场的殉道者》，在增加林佳和翻译的“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悲剧记事”和阿卫编译的“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国际五一劳动节的历史”。这四篇对干草市场悲剧介绍的中文文献（译文），内容上不一定全面、准确，有一些评论也不免主观，但相对独立，从不同的角度提示了该事件的背景、事实和意义。

正如所有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一样，美国和世界上的安那祺主义者、工会（包括芝加哥警察工会）、作家、研究者（包括为警察辩护者）和政府机构不断发掘，更清晰揭示了这一悲剧的具体细节和历史价值。光是“学者们就干草市场事件发表同样的观点已经一个多世纪里，关于这个主题发表的最近参考书目多达1530条。”³ 本文

³ Timothy Messer-Kruse, The 'Undue Weight' of Truth on Wikipedia (维基百科关于真相的“重要性不足”方针),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February 12, 2012. <http://chronicle.com/article/The-Undue-Weight-of-Truth-on/130704/> (中文译文 <http://www.guokr.com/i/0941220456/>) 作者梅塞尔-克鲁斯是波林绿色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教授，有两本关于干草市场的著述：麦克米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干草市场市无政府主义者审判：镀金时代的恐怖主义和法律制裁》*The Trial of the Haymarket Anarchists: Terrorism and Justice in the Gilded Age*，以及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将于今年年底出版的《干草市场的阴谋：跨越大西洋的无政府主义者网络》*The Haymarket Conspiracy: Transatlantic Anarchist Networks*。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为当时政府（警察、法庭）等当时主流社会辩护的立场。我注意到维基百科对这个条目的编辑，因为这一篇带有主观意愿和方法论缺欠而引起广泛争议的短文，竟然改变了论调。例如，维基百科经过与梅塞尔-克鲁斯讨论，这样描述：“由朱利叶斯·格林内尔Julius Grinnell为首的检察官，并未提供任何有关被告投掷炸弹的**可靠**证据”（可靠二字为后来加入），已经相当客观，也体现出今天关于干草市场事件的普遍意见。但梅塞尔-克鲁斯继续利用不明当时社会背景的现代学生的朴素提问，找出已经被后来也政府否决了的材料，逼使维基百科象一个法庭那样“中立”，专门介绍他的个人意见。这样做，无法反映出经过一百多年后，美国社会通过这个事件的反省和进步。所以，在引用广泛参照的维基百科的社会、政治条目时，要格外谨慎。

参照最近的资料，包括相关中文介绍⁴，主要就事件的性质和意义补充上述四文。

1886年5月1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全美多个城市同时举行罢工，罢工工人的总数估计有30-50万人。但这次工人运动的中心是在芝加哥，估计有3-4万人参加罢工、8万人参加游行。安那祺主义者阿尔伯特·柏尔森司⁵Albert Parsons在芝加哥作为组织者参与游行。5月3日，罢工工人们在麦克孔密克McCormick厂的外面举行集会，安那祺主义者奥古斯特·司柏司August Spies发表了演讲，倡议工人们团结起来，支持工会。集会开始时未出现暴力活动，但下班铃响后，一些罢工工人转向从工厂大门出来的顶替工人，彼此发生冲突。警察向人群开枪，打死两名（或6名）工人（插图）。



芝加哥的安那祺主义者迅速印制传单，号召第二天5月4日在芝加哥的集市中心干草市场广场集会。这些用英文和德文两种文字印刷的第一批传单上写着：“工人们武装起来，展现我们的全部力量！”当司柏司看见这行字时，他坚决要求取消这句口号。新印制的2万多份传单撤掉了这句口号，被大量的散发到市民的手中。但没有被销毁的小部分老传单后来成为“罪证”之一。

5月4日傍晚，天下着小雨。由于组织得匆忙，干草市场的集会八点过才开始。司柏司站在一辆四轮马车上作为临时讲台对人群首先

⁴ <http://tool.1141a.com/history/5/1/4867.html> 引用没有注明作者，看起来是译自维基百科英文原文。

⁵ 人名尽量按巴金的译法，以便统一。

演讲（插图是 2004 年在原址建立的模仿纪念雕刻）。他宣布：有人说这次集会的目的是要拉开暴动的序幕，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为了“法律与秩序”的战争准备。然而，我要告诉你们，从一开始这个集会就不提倡任何这样的目的。这次集会，是要告诉大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总形势，和如何对应在这个运动中发生的各种情况。



柏尔森司等人随后轮流对人群作讲演，集会一直都很平和，以至于在场的芝加哥市长都觉得没事了。他让带队的警察局长帮菲尔得 Bonfield 少管闲事，自己就回家了。塞缪尔·菲尔登 Samuel 斐尔登是最后一位讲演者，他在 10 点半时结束了演讲，在场的只剩下两、三百人，大家准备散场了。这时帮菲尔得却带领大批警察向马车讲台冲过来，命令集会解散，引起争吵混乱。帮菲尔得的这一举动，即使没有预谋（有人指责如此），也只是为了显示“法律与秩序”而炫耀权力，容易引发暴力。果然，不幸的事态发生了：突然，一枚雷管炸弹被扔进了警察的队伍里爆炸，当场炸死警察 Degan、炸伤多人。全副武装的警察们立即开枪，但枪击只持续了几分钟就被命令停止了，因为帮菲尔得也怕黑夜中警察自相残杀。一位警察匿名告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很多警察是被自己人的左轮手枪打伤的。每个警察都要保护自己，一些人逃到了广场的外面，其他人打光了他们的子弹，主要都是互相对射。”⁶ 确认有 4 名工人被打死、多人受伤，但很多伤亡市民害怕被逮捕，不敢公开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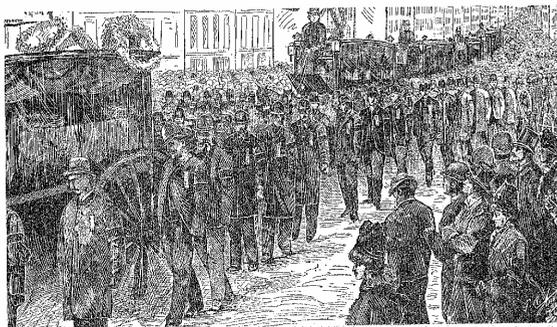
⁶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ymarket_affair 引用著名历史学家 Paul Avrich. *The Haymarket Tragedy*, p. 20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要特别指出的是：许多英文和中文资料都广泛租用一幅警察和工人在讲演者背景下互相射击的图片，误导读者。因为射击是在讲演结束后发生，没有工人用枪还击的证据。

死刑执行前，伊利诺州州长 Oglesby 迫于各方压力，把菲尔登和施瓦博改判为无期徒刑。1887 年 11 月 10 日，在执刑的前夜，林格在自己的牢房里用自制炸药自杀死亡。11 月 11 日，四名被告被绞死。英格尔、司柏司高呼：“安那祺主义万岁！”从容就义。工人哲学家斐失儿道出了现代人生的至理名言：“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柏尔森司留下挑战美国人民的预言：“我们在坟墓里沉默比被绞杀的声音更有力量的时候快要到了！”。

1893 年，本人是德裔美国人律师的伊利诺州新任州长 Altgeld 奥特盖尔德对该案作了大量调查，质疑陪审团预选、被告有罪证据、法官公正性等，都指出其缺欠，无条件释放了仍被关押的菲尔登、施瓦博和尼伯。⁸

我觉得以下的这本以美国中小学生为对象出版的图画书说明通过这一事件美国社会在思想宽容、言论自由和法律公正方面的进步。这本《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系列历史普及读物《干草广场悲剧》The Haymarket Square Tragedy 由 Michael Burgan 编写、Compass Point Books 公司 2006 年出版。本书内容只有大字体排印的 48 页，由伊利诺州劳工史协会 Illinois Labor History Society 主席 Leslie Orear 和 Boise 州立大学 State University 教育学院 Rosemary Palmer

博士作顾问审阅。书中告诉美国中小学生：
“没有人知道谁扔了炸弹，但格林烈尔 J. Grinnell 说这些安那祺主义者
‘与实际扔炸弹



Thousands joined in the funeral march of the executed anarchists.

⁸为了纠正这起司法错案，以及拒绝调动州军警镇压罢工，奥盖尔德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

者一样负责’。…他利用美国人对无秩序和暴力的恐怖挑起对这些被起诉者的仇恨”（第 34 页）“为 8 位安那祺主义者辩护的律师指责格林烈尔和他的证人撒谎，他们提出有些被起诉者 5 月 4 日根本不在干草市场附近的证明，没有任何被起诉者那天晚上诉诸暴力。”（第 35 页）“四位（死难者）马上被称为烈士，15 万以上的芝加哥民众涌上街头为他们送葬。”（第 38 页，插图）

事后，连加里法官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法庭指示违背法律判例。但加里后来不仅没有被处罚，反而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信任被提升。而仅仅实现把干草市场案件确立为严重的司法错案、把这起审判也成为陪审团审判史上的典型污点案例，也经历了



长久的斗争。芝加哥政府在爆炸地点最初建立的设立的耀武扬威的警察纪念像（插图）经过被不断的抗议（包括两次炸毁）才被移走。对干草市场悲剧的曲解⁹，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当然，要进一步改变美国社会、实现殉道者为之殉道的安那祺主义理想，又伴随了多少新的牺牲！¹⁰但是，他们的牺牲毕竟结出了果实，让我们生活

⁹ 有许多英文（和中文翻译）仍然用 riot（暴乱）来形容这个事件，“暴乱”当然不是指警察暴乱，而是工人暴乱。

¹⁰ 参照安那祺主义文库 A-1:《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万塞蒂与沙珂著，巴金译著，ISBN: 978-0-557-16157-7；A-2:《一个安那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柏克曼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2-9；A-4:《美国政治的安那祺主义传统》，赵京著，ISBN: 978-1-257-43927-0。

在一个更加自由、平等、公正、人道的社会（插图是芝加哥劳工联合在干草市场纪念雕塑侧面的碑文：伊利诺 芝加哥 干草市场，1886，美国劳工运动诞生之处）。



作为结尾，我想引用黑格尔对历史上最早的安那祺主义殉道者的评述：“苏格拉底以他的良知与法庭的判决相对立，在他的良知的法庭上宣告自己无罪。但是没有有一个民族，…能够承认一个良知的法庭。…一个国家的第一条原则是：没有什么较高的理性、良知、正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除去国家所认为公正的东西而外。教友派、再洗礼派等等，抗拒国家的确定的权利，…在一个真正的国家里面是不能立足的。这种可怜的自由，即思想和信仰每个人所愿意的东西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这种回到自己的义务的意识之中的作法，也同样是不存在的。”

“人们也许会设想，这种命运并不是必要的，苏格拉底的生活并不是必须采取这一个结局，…然而我们必须说，是通过这一种结局，这个原则才得到了它的真正的荣誉。”

“一个伟大的人会有罪的，他担负起伟大的冲突…但是他的事业，由他作出来的事情，却保留下来了。”

“从它的灰烬中便升起了一个更高的精神。”¹¹

[赵京 2012年11月28日]

¹¹ 《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一部“希腊哲学”第二章乙“三 苏格拉底的命运”第103、105、106、107页，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北京。

1886 年芝加哥干草市场悲剧记事¹²

1889 年 7 月 14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中，与会代表决议定每年的 5 月 1 日为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战斗日及庆祝日。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主要是为了要纪念三年前的 5 月 1 日，美国的工人在全美各地为争取每日 8 小时工作制而游行示威，结果在芝加哥的游行中，警察枪杀示威的工人、逮捕领导者，在随后的审判中有数人被判处死刑。

在那个时代，许多来自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来的移民，将他们在母国所受的社会主义熏陶一起带到了新大陆。随着美国工业的急速发展，对抗无休止剥削的工人运动也随之萌芽，其中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求每日的八小时工作制。欧洲来的各国移民，虽然大都是为了经济方面的理由，在自己的祖国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但亦有些是基于政治或宗教的缘故，德国后裔的情况最为明显，许多人是在 1848 年的革命梦想破灭之后，携家带着前往美国寻求充满公平正义、能够实现他们革命理想的天堂国度。随着十九世纪中叶的经济及社会危机，大量失业、饥荒及痛苦也降临了新大陆的工人家庭，许多欧洲工人移民的美梦正式破裂。此时，美国境内兴起的安那祺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不但给这些濒临绝望的工人及其家人们物质上的支援，也带给了他们新希望。但是，1886 年 5 月的事件，历史上所称之为芝加哥干草市场悲剧，摧毁了这些美国工人的最后一丝幻想。这一场悲剧显示了所谓的法治国家是何等的脆弱，而现实的阶级鸿沟又是怎样地难以超越。国际工人运动，向美国的同志们展现了他们的团结意志，也使得

¹² 作者林佳和，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

<http://2011antiovertymarch.blogspot.com/2011/04/1886.html>。本文译自 Inge Marbolek, 100 Jahre Zukunft - Zur Geschichte des 1. Mai (未来 100 年：五月一日的历史), Frankfurt a. M. 1990。这是最新的中文介绍，特别在内容上利用了事件中多数主要人物的第一语言德语的资料，富有新意。据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Haymarket_affair介绍：关于干草市场事件的裁判以前的原始材料，已经不在芝加哥，而是在东德！（编者对原译文中的英文人名改为中文、无政府改为安那祺，并根据新的史料略微修改用词。）

这一事件远远超越了它的地域性，展现了国际性、世界性的意义：这正是五·一精神的诞生时刻。下面就让我们走向记忆的长廊，一起重温这一段沉重的历史。

[悲剧的诞生]

在芝加哥干草市场上所发生的悲剧，开始于 1886 年 5 月 3 日的下午。这个时候，芝加哥警察无预警扫射一群在麦克孔密克农机工厂前罢工的工人，造成数名死亡，许多人受伤。芝加哥的安那祺主义者团体，震惊于这样血腥攻击无武装之劳动者的暴行，选在隔日 5 月 4 日夜晚于芝加哥干草市场前集会，宣布并鼓动群众进行示威抗议。就在最后一名演讲者要结束的片刻，一批警察突然冲进会场，要求这一场其实人数不多、又非常平和的集会立即结束。就在演讲者斐尔登与带队的警官帮非尔得协商，同时表达对警方之介入抗议时，突然有一颗小型炸弹丢入警察堆中，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雷管炸弹，一名警察被炸死，六名警察被严重烧伤。在火热的炙焰中，警察们陷于惊慌，拿出手枪乱射。这个意外虽然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后果却是严重的：7、8 名警察和至少 4 名工人死亡，受伤平民无以计数。从当时的政治气氛，可以想象多数伤亡的工人不敢公开自己的牺牲，警察队长 **Michael Schaack** 写道：平民的伤亡多于警察¹³。几天后，八名安那祺主义者被逮捕，遭检方控以故意杀人、意图叛乱的阴谋罪行。经过一年半的审讯，四人遭吊刑处死、一人于狱中自尽、二人被判终身、一人被判 15 年监禁。这一场法庭大戏被称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司法审判，但是这些所谓的“十恶不赦”的罪犯，在美国民间被视为工人运动的英雄与殉道者。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在分析芝加哥干草市场悲剧的成因时，必须注意两个当时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一是为争取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另一则是社会革命及安那祺主义工人运动之崛起。而且在分析此一历史事件时，亦不能忽视当时生活在芝加哥的德裔移民之生活处境、劳动条件，以及他们在旧大陆祖国所形成之抗争文化。

¹³编者注：以上引用参照了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ymarket_affair

在十九世纪的60年代末期，美国各地的工会都不约而同的提出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诉求，许多工会开始结盟与合作，成立了八小时联盟。1866年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组织全国工人联盟 National Labor Union 诞生，它的最重要运动目标之一就是要求缩短每日工时为八小时。1868年美国参众议院通过第一个保障八小时工作制的联邦法案，受惠者是联邦的公务员，而伊利诺州更早在一年前就通过该州的八小时法。为了庆祝这样的成就，伊利诺州首府芝加哥的工人们就开始发起一连串的五月游行，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在1868年五月的这一次芝加哥游行中，长达数公里的游行队伍，吸引了数万名的芝加哥市民围观，工人们手持布条，上面写着“团结让我们壮大、分裂让我们渺小”、“八小时 - 一项法律的成就”、“我们尊重本州的法律”。游行队伍中的德国支队最引人注目，因为他们把平日劳动的成果与产品直接装置在车子上，不但阵容状盛，而且光彩夺目。讽刺的是，到十年后的1876年，八小时法不但形同废物，被企业主们嗤之以鼻，而且还遭伊利诺州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而废止。

1860年代经过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七十年代的大萧条，这也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经济危机。1873年9月，许多银行宣布破产，数十万名工人瞬间丢掉工作，流落街头，几百万人只得打零工或忍受条件恶劣的就业来糊口。1877年情况不见好转，失业人口已逾三百万人，饥饿与痛苦的阴影笼罩着工人及他们的家庭，在工人居住的地区街道上，只看到难以计数的游民，等着领取好心的慈善机构分送的面包汤汁裹腹。

虽然几乎没有一个工会能安然度过1860年代的严峻考验，但是受难的工人及失业者们却非毫无动静的忍受如此的悲惨处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越来越激进的抗争路线，所谓的“饥饿行军”、“面包动乱”、各式各样的示威与游行，每天都在许多的美国大城市，特别是纽约及芝加哥展开。群众们的呼声与呐喊越来越响亮：“我们要立即的协助”、“我们马上需要工作”，而各个大城市的市政府及大企业业主们的观感如何呢？他们觉得厌恶，这些无能穷人们的所谓痛苦实在令人深感恶心，但是他们也同时觉得惧怕，社会怎么可以如此动荡不

安呢？于是，警察部队又出现了，经常出现的工人示威游行，到了最后，总是以警察暴力的强制驱散收尾。

工人们的运动及抗争，逐渐累积为 1877 年的大罢工浪潮。1877 年，由于铁路业的恶性竞争，许多铁路公司单方强迫压低工资，不然就大量的裁减工人，进行所谓的企业合理化措施，在这一波冲击中，工人们的工会组织被铁腕摧毁、领导人物品们被列入黑名单，广发各企业周知，不让这些工运份子有另谋生计、“趁机谋乱”的机会。激烈的措施，长久的积压，终于引发了至今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潮。1877 年的大罢工开始于西维吉尼亚州，但一下子就蔓延到全美各地，虽然起初是铁路公司工人的罢工，但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被强迫降薪或被威胁将压低工资的工人们不断的加入，一开始被认定为所谓的全国铁路工人罢工，转眼间即将变成遍及各行业的总罢工。政府部门与企业主的回应，又是运用警察暴力的铁腕镇压，单单在芝加哥，每日就上演着如内战般的巷战火拼，工人们面对的，不只是警察，还有州的民兵以及联邦的部队。在芝加哥，工人的罢工在两天内就被平息，许多平民死于巷战，无数的工人负伤，而警察也逮捕了三至四百人入狱。

虽然全美的罢工潮没有带来任何经济或社会方面的改善或承诺，但它对美国的工人运动却影响深远。资本家、政府与警察的紧密携手，合作无间的运用暴力来镇压罢工，使得许多奋起的工人们体认到，唯有团结组织才能对抗自己的敌人。在如此的风潮下，工会运动大幅跃升，许多工人争相恐后加入工会，新的工会及工人政党渐次成立，特别是工人党 Workingmen's Party，在许多大城里，也包括芝加哥在内，都变为地方政治的领域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大企业深感威胁，极力向政府施压及游说，要求重组军事部队结构、增强武装力量，必须研拟新而有效的镇压暴动方法与武器，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1877 年的事件真正的撼动而摇醒了所谓的新大陆天堂的美国梦想，美国也无法自外于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是最赤裸裸的暴力与武装冲突。

[十九世纪末的芝加哥工人]

激烈而血腥的冲突会发生在芝加哥，其实非事出偶然。在金钱的大都会中，没有一个美国城市像芝加哥这样，资本的积累如此迅速，赚钱的游戏如此高涨，投机、贿赂、贪污腐化如此盛行，也没有一个大城像芝加哥这般，一般工人及平民的贫困如此严重。1834年建城的芝加哥，50年后已迅速成长到八十万人口，1910年就快速的超越两百万的大关。芝加哥的扩与成长，运输与公众交通网络的发达，加上人口的不断移入，随之而来的是惊人的工业进步与发达。在短短数年之内，芝加哥成为钢铁生产的重镇，机械及粮食、木料的交易中心。除了高技术性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外，这里也聚集了无数的中小型企业及商家，纺织、成衣、家具、烟草、皮革，形成了许多家族型企业的事业产品及发迹的希望。

芝加哥的工业发达与经济的蓬勃发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而事实上，没有这些来自旧大陆的劳动者的辛苦贡献，芝加哥的繁荣也是无从萌芽的。在1880年代，大批前往芝加哥的欧洲移民，多半来自英格兰、爱尔兰、德国及斯堪地那维亚的诸国，以此时为例，芝加哥市有41%的人口是直接来自于欧洲的移民，还不包括他们在美国所出生的后裔。许多的旧大陆移民选择与同胞们比邻而居，以母语沟通，上自己人的教堂，只阅读母语书写的报章杂志，而且只参加同胞们组织的各种俱乐部及团体。这些移民的夜晚及周末，大都在同胞们开设的街角酒馆度过。芝加哥就像美国各地的小缩影，不同民族的文化独立在各自的领域中发酵与制约，也俨然成为排外与区隔的堡垒。

1890年，芝加哥市庆祝人口超越百万大关，在所有几乎占一半比例的外国移民中，德国占有35%强，是所有移民中的最大民族，假如也算入他们的后裔，整个芝加哥就有将近30万的德裔美国人。在芝加哥的德国族群中，他们也一并承继了母国惯常的阶级结构及文化：德裔的企业主及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俱乐部，自己的足球联谊，参加自己阶级的同胞所举办的活动，也只阅读同一阶级所写的德文报纸。伊利诺国家报 *Illinois Staats Zeitung* 专为有钱的德国佬服务，而贫穷的德裔工人则只会看自己人办的芝加哥工人报 *Chicagoer Arbeiter Zeitung*)。

在 1850 年，工人阶级仍占德裔美国人中的五分之四，但是到了 1900 年，就只有三分之二的德国移民是劳动者，这虽然显示第二及第三代欧洲移民的稀释，以及所谓阶级阶层往上流动的结果。但无疑的，工人阶级仍然是德国族群的最大多数，在接近十九世纪末的几年内，德国后裔也同样是在所有芝加哥工人阶级的最重要族群，平均都要接近四分之一强（如 1890 年底的 22.5%），特别是在重工业及手工业的部门，德裔工人的影响力更是明显。

1873 到 1878 年的经济危机一过，工资呈现略升，但好景不常，1882 年开始的五年中，工资就又急速下降，平均倒退了 5.7%。这一次的工资危机，却是所谓结构性的：不只是工厂中的低技术工人，即使是较纯熟或一定技术的工人、手工业者，如木工、鞋匠、烤面包师傅，都严重的受到新型机器的威胁，工资水准不断的面临挑战。这个前所未有的所谓结构性失业：1884 年在芝加哥已有三万人以上失业，加上季节性的就业市场波动，严厉的冲击工人的家庭生计，工资与收入不断的下降。以伊利诺州劳动部 1884 年的报告为例，40% 的工人家庭支出远高过于收入，而虽然同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是两个人以上在赚取家计，“工作的穷人” working poor 这个美国二十世纪末的写照，其实早在百年前就悲剧性的出现了。就算还有工作可以做，工厂中充斥的，也只是伴随着最低工资的每日十六小时工作制，辛劳苦难的挥汗洒泪工作，工作能力的淘汰，以及下工后看到的家徒四壁与恶劣的居住生活环境，而家中任何一人的意外，不论是疾病、工殇或死亡，就足以轻易的将这个工人家庭推入痛苦而无望的深渊。

1883-84 年的冬天，芝加哥的工人处境已经糟糕到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了，即使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资产阶级们也看不下去，跑出来作一个研究工人劳动条件的调查，希望了解工人邻居们的真正情况。芝加哥工人报的随行者 Paul Grottkau，只跟着调查的公务员作一天的访查，就作呕的要求退出：大家都震惊于极端恶劣的工人居住环境，过度拥挤如蚁窝的大杂院公寓，缺少最起码的厕所及卫生设备，光线及通风极差，瘟疫及传染病随时有流传的可能。

这就是一个美国大城市的真实面貌，一个对移民来说充斥着期待、梦想、希望与幻觉的美国梦所在。如果我们阅读一位来自德国、后来也在干草市场事件中被逮捕之安那祺主义工人的日记，就可以略为领悟当时许多工人们心中共同的失望：想要在美国作个小生意，当个独立快乐又有钱的小老板，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而手工业及技术工人的被排挤及失业的机会，倒是与祖国德国的悲惨情况不相上下，假如相较于生活的支出水平，我们在新大陆反而还比逃离的旧大陆赚得更少。

既使在德国，社会的贫困与悲惨也从未达到此时美国大城市的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期待梦想与现实的落差，所带来的德裔工人逐渐不满与激进的结果，特别是美国警察践踏人权的强制与暴力镇压，更是直接将德国工人阶级推入激进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动力。

[芝加哥 - 安那祺主义运动的中心]

在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交替时，芝加哥的德裔工人就组织了自己的政治团体，而且组织结构上完全仿照母国，理念及斗争理论上完全习自祖国的导师马克思及拉萨尔。由于德国工人在许多手工业及重工业部门中占多数，特别是在技术性的工人方面，也因此德国人的领导下，许多部门成立了工会组织，第一波高峰是 1874 年由昔日的国际工人联盟 Internationale Arbeiter Association 成员所组织成立的伊利诺工人 Workingmen of Illinois。1876 年，以这个组织为班底，再结合其他美国大城（特别是纽约）的同志们，共同成立了美国工人党，也就是后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在如此之社会主义路线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也伴随着日渐升高的经济及就业危机，芝加哥的德裔工人们创设了芝加哥工人报，也因为这个工人资讯及理念媒介的诞生，使得后来干草市场事件的领导及殉道的先驱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理想的冲击及薰陶。数以千计的芝加哥工人们，参加由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办的群众大会，而且争相加入许多的结盟团体，在 1879 年春天的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候选人施密特博士获取极多的选票，也大大振奋了工人的政治运动。

好景不常，社会主义工人党此时竟面临了意想不到的组织危机：1879年，同一年秋天的选举，社会主义工人党流失了60%的选票，到了年底，党员大幅退党，人心浮动，揆其缘由，失业问题的缓和是主因，但是成员间不断的路线冲突，以及领导阶层的争辩与不和，应亦难辞其咎。一个重要的冲突导火线是所谓的“武装问题”。1875年，一小部分的芝加哥社会主义工人，几乎全为德国移民，成立了自卫团，他们的目标是在军事上及政治上武装自己的同志，以在游行时对抗并还击警察及民兵的攻击。在1877年7月的事件后，这个自卫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渐渐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中主张用武力来实现社会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却与党内其他地区领导者的路线相左，因为许多其他大城的工人运动者认为，暴力对他们的政治目标而言是有害的。在这样的冲突下，1880年多位芝加哥地区的党员，特别是司柏司、柏尔森司、尼伯、Paul Grottkau，纷纷被开除党籍。

芝加哥的这些工人运动领导者，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理想高涨的运动中，重新另起炉灶。在芝加哥当地，司柏司及柏尔森司渐渐获得领导权，在纽约，Johann Most透过著作及演讲，吸引了许多工人支持他的安那祺主义路线。1883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匹兹堡召开代表大会，进而另行组织国际工人联盟 International Working People's Association，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安那祺主义路线的国际组织。司柏司、柏尔森司及Most联合起草了该组织的成立的匹兹堡宣言。

但是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芝加哥的同志们无法与纽约的Most达成共识，就是组织路线与工会的关系：Most认为应该完全拒绝与工会合作，而司柏司与柏尔森司却把工会看作是阶级斗争的重要角色及未来社会秩序的核心基础。经过冗长的讨论，芝加哥派的看法占了上风，他们对于工会角色及功能的描述写进入最后的宣言中。

在匹兹堡大会及后来的干草市场悲剧的三年间，国际工人联盟发展极为迅速，使得芝加哥成为美国安那祺主义运动的中心。国际工人联盟在芝加哥设立了联络处，也在这里成立了联盟内最大最多人的支部，同时支援由司柏司掌控、以德语发行之芝加哥工人报、先驱周刊

Der Vorbot、周日特刊火炬 Die Fackel，以及由柏尔森司担任总编辑之英文刊物警报 Alarm。芝加哥工人报每日发行六千份，当然，阅读的人口远超过此数，每一个德国移民居住地区的酒馆内，都有这一份报纸的踪迹，它已成为芝加哥安那祺主义运动的资讯交流及传递媒介。

1883-1886年，经济危机再度降临，失业与饥荒又无情地笼罩芝加哥。贫富差距的悬殊，阶级的冲突对立，加入贪污而又血腥暴力的警察，随着准备无情的用棍棒镇压工人的权利，在在都使得安那祺主义的思想蔓延开来。1884年，在司柏司及 Grottkau 的领导下，进步烟草工人工会改组为一安那祺主义路线的工会联合组织中央工人联盟 Central Labor Union，短短的一年多，1886年初，中央工人联盟的势力就大大的超越了它主张修正主义路线的对手，所谓的职业与工人组合 Trades and Labor Assembly，而中央工人联盟的核心干部大都是来自德国的移民后裔。

安那祺主义的理念不只存在于宣传的册子或演讲当中，也不只存在于酒馆烟雾迷漫的热情对话中。对于许多的工人及其家人而言，安那祺主义其实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有生命的文化，充斥在日常的行止、休闲、野餐、跳舞、音乐会、庆典及许许多多的游行之中，不论任何的演说、戏剧或朗诵，安那祺主义的思想都隐藏在其中。在极短的时间内，安那祺主义倾向的各类团体纷纷成立，合唱团、足球体操俱乐部、戏剧社、文学团体等，吸引着无数的有志者、旁观者、局外人、妇女及儿童，安那祺主义的思潮并非隐藏在人们的心中，藏私于门下床地，而是大规模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影响着他们的行动与思考。

当然，安那祺主义的运动并非都是这么平和的，也许在游行及示威的行列，在高举的旗帜、耀目的花车、引人的讽刺剧中，在高声承诺众人一个美好的未来，严斥那些造成社会贫困的始作俑者的时候，芝加哥的安那祺主义运动才真正展现它的影响力。透过游行，安那祺主义者向对手展现实力，向支持者展现团结的力量、凝聚意志与情感；芝加哥安那祺主义运动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带有政治内容的娱乐

与欢娱方式，将阶级斗争与庆典仪式结合，用传统的社会活动来企图实现革命的目标。芝加哥的节日，不管是七月四日的美国国庆、感恩节，或是巴黎公社的纪念日，街道都上演着安那祺主义式的游行与庆祝。安那祺主义的工人文化，不只出现在这些耀目的游行示威中，芝加哥市内可供人饮酒、跳舞、作运动的无数小公园，每逢周末，就变成安那祺主义工人们的天下。工人居住地区的沙龙与聚会所，不管是 Zepfs Halle、Neffs Halle 还是 North Side Turner Hall，都一起代表着这个城市激进生活的一面。

[芝加哥 1886 年 5 月 1 日与 5 月 4 日的干草市场事件]

这个时代美国工人运动的主要诉求仍是缩短工时，所谓的八小时工作日。1884 年，美国职业与工人工会联盟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也就是后来美国工会联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的前身，在年度的大会中，通过接续 1860 年代以来缩短工时的要求，并且决议“1886 年 5 月 1 日开始及以后，一天的劳动工作时间必须仅为八个小时”。

秉持安那祺主义路线的国际工人联盟，虽然在起初仍将这项决议视为所谓的改革路线的产物，但仍然决定支持这项工人运动的诉求，特别是在芝加哥地区的领导者，而他们，包括司柏司、柏尔森司、斐尔登及失瓦伯在内的芝加哥工运干部，也同时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推动者。1886 年，推动八小时工作制的宣传运动达到颠峰，在芝加哥，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相关的群众大会，传单不断的散发，演讲不断的举行。在宣扬缩短工时的同时，安那祺主义者不忘同时提醒所谓的武装问题，也就是要求工人必须自己武装起来，对抗并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体制，工人武装 Bewaffnung der Arbeiter 的呼声日高。1886 年 4 月 25 日，也就是在要求实践八小时工作制的最后通牒的前几天，中央工人联盟再度举办盛大的游行示威，从芝加哥北区的街道，一直延伸到密西根湖畔，总共有超过两万五千名的群众聚集，聆听所景仰的安那祺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演说。这次游行是美国历史上公认的工人运动的典范，但在当时，芝加哥商界的反应却是无比惊恐，大拉警报，因为工人阶级所展现的团结及力量使他们深感威胁。几天后所发生的

干草市场事件，其实正是芝加哥资产阶级畏惧感受的延伸，资产阶级的感触及决定是：这再也不是跟强而有力的工人运动之间的实力拉锯问题，而必须要根本的将它摧毁及连根拔起。

1886年5月1日，全美各地有三十万名工人走上街头，单单在芝加哥就有四万人，来自工业及手工业各部门企业工厂的劳动者，丢下他们的工作，进行罢工与游行示威。当时的一家报纸记述，芝加哥市呈现着星期日一般的宁静，烟囱停止冒烟。工人在街上游行，不停的呐喊诉求，不断的用英语、德语与捷克语嘶声演说，在国际工人联盟及中央工人联盟的领导下，有八万名工人带着他们的家人及孩童，沿着密尔瓦基大道唱着歌曲。芝加哥的媒体反应激烈：带头的司柏司与柏尔森司被严厉咒骂：你们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必须为芝加哥数十年来的不安负责，我们美丽的大城随时将爆发暴动与骚乱。让这些媒体很失望的是，5月1日当天，芝加哥像密西根湖的湖面那样平静。

两天以后，5月3日星期一，媒体盼望的骚乱开始了：为了支援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诉求，芝加哥各角落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下午时分，有数千名的工人聚集在恶名昭彰的麦克孔密克农机工厂前。麦克孔密克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地点：1877年，它的资方用极残暴的手段压制罢工，使这里一举成名。在1886年，几个月来工厂不断引进新的机器，不但因而解雇了许多工人，也强制的压低了劳动者的工资，工人虽组织罢工来对抗，但资方的锁厂及引进替代劳力，尤其是在臭名远播的Pinkerton警官的保护下，使得罢工无甚成效。5月3日下午，在许多的演讲过后，轮到司柏司讲话，他没有客套的开始，直接指出麦克孔密克工厂的情况，进而要求在场的工人们要武装起来。司柏司演讲方歇，工厂的计时钟正好响起，下班时间到了，约两百名在场的工人立即脱离群众，奔向工厂的大门，怒骂破坏罢工的替代工人。几分钟后，双方动起手来，居中的警察也被丢石头攻击。一转眼，警察掏出手枪，往混乱的群众中射发，工人们四散奔逃。总计有许多工人受伤，两人被当场击毙，警察虽无人死亡，但也有人受了轻伤。

司柏司在震惊之余，立刻跑回芝加哥工人报的办公室，马上用英文及德文制作煽动的海报，要求工人们立即武装起来，向屠杀他们同志的阶级敌人报仇。这张海报的标题是：“工人们，拿起武器！”，一名排字工人在没有经司柏司的同意下，擅自在标题内加上了“报仇”。这张海报后来成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报仇传单”。

现在，暴乱与事件越滚越大。5月3日当天晚上，大概有一千五百份的海报在城内散发，约莫同时，有一群包括 Georg 恩格尔及 Adolph 斐失儿在内的德裔安那祺主义者，正在西北区的聚会所的小房间内集会，他们同属安那祺主义运动中最激进、最不妥协的暴力派。这些人正在商议如何利用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中将发生的工人与警察之冲突，进行自己的计画。毫不意外的，会议中热烈讨论这一份“报仇传单”，最后大家决定，在隔日5月4日的晚上7时30分，在可以容纳两万人聚集的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的活动。但是，会议中并没有提到要利用这次机会进行武装暴动。

斐失儿被指定准备这项集会，要去印制海报、安排演讲者，而包含英德文的海报的最后必须有这些文字：“工人们，武装起来，一起上战场”。斐失儿希望能争取到司柏司来演讲，但是司柏司却不感兴趣，经不起再三的请托，司柏司终于答应出席，但附带一个条件：必须将海报中要求武装的字样删除。斐失儿马上同意，命令排版工照办，同时将先前已经印好的海报全部销毁。但是百密有一疏，数百张已印好的旧版本海报仍然流出，这也变成了后来控诉审判这些安那祺主义者“罪犯”的关键证据。

1889年5月4日下午，芝加哥市长哈利生 Harrison 知道了干草市场即将举行群众集会的讯息。基于全城歇斯底里的惧怕不安的气氛，哈利生急于想扮演一个居间协调的角色，希望不要让冲突扩大。哈利生决定，由于集会及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加以保障，因此不宜禁止举行，但是政府方面必须严防可能的暴力冲突，于是他指定帮非尔得警官，带领一个警察中队在干草市场附近的警察局待命，另外也安排一些便衣混在人群之中。

晚上7点45分，司柏司与他的弟弟离开家里，直赴芝加哥干草市场。由于一般的大会都习惯以英语的演说来起头，因此准备以德语来演讲的司柏司还可以静候一些时间。半小时后，司柏司来到会场，出乎意料之外的，竟然只有约三千名的群众在场，而且活动也根本还没有开始，因为该讲英文的人没有一位出现。大家推派了一人去寻找柏尔森司，于是司柏司只好勉强上阵，先用英文来开场演讲。一开始，司柏司就字字清晰的强调，今晚的集会主要是为了控诉前日的警察暴行，不是要来制造暴动。到了9点，柏尔森司跟斐尔登一起来到会场，柏尔森司随即向大家讲了约一小时的话，相对于几天来的不安与焦躁，柏尔森司的语气其实十分和缓。柏尔森司不断的拿芝加哥的警察暴力，来比拟俄罗斯、西班牙或德国的独裁专制政权。

柏尔森司演讲结束后，在旁观察集会的市长哈利生松了一口气表示，不论现场群众的反应，亦或演说者的内容，都不足以引发暴动，而据在场的便衣警察事后的追忆，他们当时也都同意这项观察。市长于是发令给在警察局待命的帮非尔得警官，建议他可以散队回家，帮非尔得虽然也赞同情势很平和，但坚持应继续待命，保持警戒状态。

最后一名演讲者斐尔登踏上作为讲台的大卡车，在平静的气氛及语调中，开始了他的演说。进行到一半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许多早已不耐的听众终于选择离开会场，不是信步返家，就是直奔附近的聚会所去等待同志。现场只剩下不到三百人还在继续聆听斐尔登的讲话。但是等到斐尔登准备结束，一队警察突然冲了进来，而一颗炸弹却从天上掉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混乱中，斐尔登跟司柏司的弟弟都受了伤，但是他们还能仓卒而逃，得以跑回附近的聚会所去惊魂甫定。不到五分钟，这场所谓的干草市场暴动就划下休止符了，一名警察的当场死亡显然是因为炸弹引起的伤势恶化，但其余六名接下来数周与命运搏斗的重伤警察，却大都是因为被他们同僚的左轮射伤所致，当然，在随后展开的歇斯底里的审判及控诉中，这一事实在也没有人提及。许多平民也受伤，但一直没有明确的数字，只能确定的是，广场附近的药房几天

内都挤满了要求疗伤的病患。虽然没有官方公布的数字，但根据私下的了解，工人方面大致有七或八人死亡，三十至四十名受轻重伤。

[审判]

从客观事实来看，虽然丢掷炸弹的元凶始终没有抓出，但是必须为这场所谓的暴动负责的，其实还是芝加哥的警察，因为至少人们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警察最后还是选择介入？警察所要防卫的危害到底在哪里？

接下来的数周内，芝加哥城充满了恐怖的气氛：舆论大声鞅伐热心政治的异议份子及外国人，不论你是哪一派别、哪一国的后裔移民。舆论要求严厉制裁这些坏份子，为了公平正义，为了人道及法律尊严，人们咒骂及仇视这些捣乱危害社会的人。工会及移民所组成的团体，特别是德国裔的团体，都声明与这些安那祺主义者没有关联，因为当时显现的“民气”是：谁同情这些暴徒，谁就要准备上审讯台。

警察非常尽职的持续暴力搜捕安那祺主义运动的“暴徒”：虽然没有搜索票，警官们仍然费心的搜索嫌疑犯的住宅，逮捕了数百名男男女女的安那祺主义者，而且以刑求、威胁或利诱等文明或不文明的方式进行审讯，谋求他们所要的公平正义，或至少是起诉与判罪所需要的证词。1886年5月27日，事件三周后的一天，柏尔森司、司柏司、失瓦伯、斐尔登、恩格尔、斐失儿、尼伯、林格、William Seliger 及 Rudolph Schnaubelt 等一千人被提起公诉，罪名是故意谋杀警察。

司柏司、失瓦伯、斐尔登、恩格尔、斐失儿、尼伯、林格在起诉后几天内被警方逮捕，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自然从无逃亡的念头，恩格尔、尼伯跟林格甚至在干草市场事件发生后几天，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失瓦伯在当天炸弹丢掷出来的同时，正在芝加哥的另一个角落的聚会中演讲。换句话说，这些人至少应还有不在场的无罪证明。Seliger 后来改列证人，于是不需要逮捕，因此只有柏尔森司和 Schnaubelt 适时离开芝加哥，躲藏在安全的处所。在接下来的审判程序中，由于安那祺主义者所聘请的辩护律师

Captain Black 主张唯一的“纯正”美国公民柏尔森司应该主动出现，以博取法官的同情与好感，因此柏尔森司自己跑回了芝加哥，跟同志们一起坐在被告席上，而 Schnaubelt 就从此无影无踪。当然，Schnaubelt 此举也要付出代价的：从今以后，所有谈到真正丢雷管炸弹的罪犯，都首先指向他的头上。

这场审判是美国司法史上有名而史无前例的一场戏，因为被告几乎没有任何主张自己无罪的机会。法官加里 Joseph E. Gray 主持审判，诉讼开始后没多久，所有的人都清楚的看出，对于被告们丢掷炸弹的谋杀指控是无从证明的，既使冠上阴谋犯的罪名，也找不出足以支持的证据。但是整个气氛显示，对于法官、陪审团跟舆论而言，事实历历在目，这些“法律的细节”对发现真实的过程是毫不重要的，关键的是，我们要定罪这些被告，我们要定罪这些安那祺主义的运动，我们要让工人及群众永远不再受这些思想的荼毒，要让他们恢复平和而善良的本性。陪审团闭关几个小时后就作出裁决：柏尔森司、司柏司、失瓦伯、斐尔登、恩格尔、斐失儿与林格判处死刑，尼伯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舆论热烈的赞同这项迟来的正义。判决宣告后，辩护的律师团再接再厉，继续奔走，到了 1887 年 3 月，本案终于向伊利诺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舆论对于所谓干草市场事件的安那祺主义者的态度，突然呈现急转弯。看看本案所抛出的问题及现象：这些人被控丢炸弹、蓄意谋杀，被判处死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场，检察官所刻意挑选的、本来就对这些人深怀敌意的陪审团，可信度令人存疑的、态度无比激昂的证人证词，处处表达最大心愿就是将被告吊死的法官，以及被告所一再强调的，他们是因为确信、因为良心、因为主张，而不是因为暴行而站在这里接受审判，这些都牵动了美国自由主义者的心弦及法律感情：这是一场公平而正当的法庭审判吗？

这群渐渐同情安那祺主义者的自由派中，以 William Dean Howells 最为活跃，开始推动力促将整个案子重审。而同时，许许多多的工人及他们的团结组织，都兴起警觉的意识，直指这场审判是针对他们而来杀鸡儆猴的。慢慢的，逐渐形成一股声援这群安那祺主义者

的团结运动，工人运动的同志们也募集了大部分的律师费用及支援基金，以实际行动来挺这群英雄受难者。

在这段时间，监禁的被告都待在库克郡监狱等候执行。他们每天可以有两次会客，亲人、朋友、同志们络绎不绝的到来。受刑人们每天忙着写信及自传，也不忘为警报及芝加哥工人报等刊物报章撰写狱中的札记，当然，这些稿件要靠朋友的私下夹带出监狱，而且也只能匿名发表，其中多数都是用芝加哥工人报现任编辑的名义刊出，也正是借着这样的方式，司柏司继续掌握报纸的主要内容。所有的访客，即使是初次认识这群安那祺主义者的陌生人，都一致的对他们之沉静、镇定、甘于受难的态度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没有一人曾表达悔恨，或对安那祺主义运动敬而远之的冷漠。

1887年11月2日，伊利诺州最高法院驳回再审的申请，法院执行官员同时定同月11日为行刑日。声援的团结组织再度动员，希望敦请伊利诺州州长Oglesby能够下达特赦令，其中只有司柏司、斐尔登及失瓦伯在朋友的百般劝说下，不情愿的签下自己的特赦声请状，几个小时后，司柏司坚持撤回，不愿再与州长打交道，而斐失儿、恩格尔、林格及柏尔森始终拒绝认罪，他们心意已决要当殉道者，正大光明的迎接死亡，决心为社会被剥削欺压的人牺牲。

舆论要求州长重新考虑的压力与呼声日高，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呼吁务必要特赦这些无辜者，州长最后决定，再听听芝加哥商界领袖的意见。他敦请了五十位大企业主前来州长府一坐。Pullman、麦克孔密克（5月3日事件现场企业的拥有者）及Marshall Fields三位大老板不假辞色地要吊死这七名罪犯。行刑的前一天，林格在狱中引爆自杀。几个小时后，伊利诺州州长宣布他的决定：司柏司、柏尔森、斐失儿及恩格尔，因为罪无可悯，仍然处以吊刑，斐尔登及失瓦伯改为终身监禁的无期徒刑。司柏司等四人在1887年11月11日11点钟，于行刑场吊死，刽子手刻意不让他们“享受”比较没有痛苦的断颈吊刑。

送葬的行列变成一场宣扬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大游行，表达出：这些受难者不是孤独的独行侠，他们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也是整个美国德裔工人运动、美国本土之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不容否认的，虽然最后的吊刑引发许多同情受难者之人的愤怒与失望，但主流的社会舆论却肯定行刑。如报纸所言，“这是对芝加哥干草市场血腥暴行的一次正当复仇”，许多所谓的知识份子及社会精英也非常乐意的看到，安那祺主义运动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媒体中对于如此的不正义，只有极少的批评与遗憾。

对于他们的家人及运动同志而言，这八个人成为殉难的英雄，在许多的美国大城，也远在旧大陆的欧洲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哀悼及纪念的仪式，而 11 月 11 日 亦成为芝加哥工人意义深远的的一个纪念日，接下来数年中，每逢这一日，芝加哥地区的工人们都要举行示威及凭吊游行，不同派别的工人团体及工会也不忘举办纪念的集会，借着演说、朗诵、歌唱与默哀，工人们不只怀念殉难的英雄，也同时继续专注于现实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在许多的演说场合中，司柏司的遗孀 Lucy 经常出现，而这些活动也通常会到最后发起募捐，作为遗族们的经济后盾。每年的 11 月 11 日总是特别的一天，芝加哥的同志们甚至为此组成一个尔后非常知名的先锋援助协会 Pioneer Aid and Support Association，专司负责活动的筹备及支援受难者遗族的事宜。

对于仍在狱中服刑的尼伯、失瓦伯及斐尔登三人，外界希望能特赦他们的奔走一直没有停歇，但是要等到 John P. 奥特盖尔德就任伊利诺州州长时，特赦的希望才露出一线曙光。奥特盖尔德是在德国出生、美国长大的欧洲移民后裔律师，是自由、进步派及难得的正直政治家¹⁴，他仔细的审阅有关本案的所有卷证，特别是审判中许多人士的证词，他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所得到的个人印象及直觉判断也越来越鲜明。奥特盖尔德声明：审判程序有诸多地方违法，法庭内充斥着个人式的报复心态，采证过多虚假而有伪造之嫌的事实，特别是主

¹⁴ 他在 Pullman 工人罢工期间，顶住资方等压力，拒绝派州卫队武装介入（编者注）。

审法官加里的蓄意偏颇及不公正，而最重要的是，当时安那祺主义者及其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所有证据及说词，事后看来都经得起考验。于是新任的州长决定，依然在监禁中的三人加以无罪释放，不是特赦，而是完全撤回之前对他们的控诉及审判。

芝加哥的大企业主们大为吃惊，他们认为奥特盖尔德（插图）一定要为他的荒谬决定付出代价，让他丢掉州长的宝座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伊利诺州政府陷于群龙无首，补选遥遥无期，虽然社会舆论渐渐认为特赦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普遍却仍以为，暴行确实是事实，只不过有所偏失、被伤害美国人对司法崇敬的法庭闹剧所搞坏罢了。



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的影响及历史意义是深远的：芝加哥地区的安那祺主义运动从此一蹶不振，八小时工作制日的抗争也在随后的岁月中消声匿迹，以后只要出现工人的抗议或是要推动对工人有利的政策，都会在意见市场上被冠以“外国人或非美国人的外患作乱”。对于许多人而言，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也正式宣告了美国民主体制及法治国的伪善及寿终正寝，它的阶级本质凌驾于一切，人人平等的美国梦只是幻觉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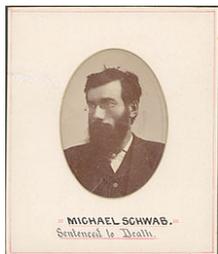
对于美国的德国移民（不只是对芝加哥当地的德裔）而言，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也留下不可泯灭的伤痕。对于渴望晋升为中产阶级的德国移民来说，对于这些安那祺主义者的态度成为他们是否对美国社会忠诚的试金石：唯有选择明白而清楚的谴责这些德国同胞的荒唐，他们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对于德国后裔而言，从此只有阶级的界限问题，不再有超越阶级的民族认同的可能。

【干草市场事件的受难者】

August 司柏司：被起诉时 31 岁，出生于德国 Landeck，职业家具木匠，1872 年移民美国，1884 年起为芝加哥工人报编辑，英语及



德语均甚流利，与柏尔森司同为芝加哥工人运动的知名领袖，不论是理论或行动、组织及演说方面。与母亲、妹妹及三个弟弟住在芝加哥市的西北区，所有的家人都一起经营小型手工店铺。



Michael 失瓦伯：34 岁，职业书本装订工，出生于德国 Kitzingen，1879 年移民美国。未移民前便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工会，曾受良好的教育，1881 年起担任记者及芝加哥工人报的助理编辑。失瓦伯以冷静和善著称，其认真与热情均极受推崇，与太太和两名孩子住在芝加哥市的北区。

Adolph 斐失儿：25 岁，排字工，出生于德国 Bremen，1873 年移民美国，1883 年起定居在芝加哥。在芝加哥工人报担任排字的工作，从小父母就授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芝加哥是安那祺主义运动中的所谓自主派的成员，亦加入自卫团，极力主张工人应武装与运用暴力。1881 年结婚，育有一名子女。



Georg 恩格尔：51 岁，是所有受难者中最年长者，职业油漆工，1873 年带着太太及家人移民美国。他跟斐失儿一样隶属所谓的自主派，智识不高，但以无政府运动中的“激烈士兵”的名号著称，为人热情、激昂，但长年与司柏司及柏尔森司不合。与太太、女儿住在芝加哥西北区的密尔瓦基大道，并由太太经营一家卖

玩具的小店铺。

Oskar 尼伯：37 岁，职业白铁工，已婚。与其他同志很不一样的是，他出生于美国纽约，却在德国长大，直到 14 岁时才又随父母亲回到美国。在芝加哥与弟弟一起经营专卖酵母发酵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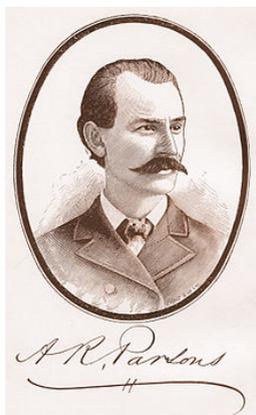


店铺。在安那祺主义运动中不是受人注目的人物，但以组织工作见长，例如在筹组中央工人联盟的工会组织时，就占有极重要的份量。



Louis 林格：22 岁，出生于德国 Schwetzingen，1885 年，也就是事件前一年才移民至美国。因年轻时在德国的革命经验，激烈反对资本主义体制，但个性上玩世不恭、轻佻随便。与恩格尔和斐失儿一样，也是毫无妥协的暴力主义拥护者。他主要在芝加哥负责国际木匠工会 International Carpenters' and Joiners' Union 的组织工作，其成员大都是德国后裔。在所有的受难者中，他是唯一知道如何制造甘油炸弹的人。

Samuel 斐尔登：40 岁，出生于英格兰 Lancashire，1868 年移民美国。家庭有浓厚的民权主义传统，在年青时代就极关心反奴隶的运动。与柏尔森司及司柏司一样，因为他温暖而和善的个性，同为芝加哥安那祺主义者中受人爱戴的干部之一，亦是相当积极的演说家及组织工作者。职业是卡车工人，主要在帮街道施工运送石头。



Albert 柏尔森司：37 岁，职业排字工，出生于美国新英格兰，成长于德州，1873 年偕太太 Lucy 定居在芝加哥，活跃于工会运动、社会主义工人报及后来的国际工人联盟。担任英语发行的警报刊物的编辑，太太也在其中帮忙。他可说是干草市场事件中唯一所谓“纯正”的美国人，使得他在这场事件中的地位十分特殊与引人注目。

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¹⁵

—国际五一劳动节的历史是这样写成的

人们都知道每年的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国际劳动节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日子会订在五月一日这一天？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美国各不同行业、不同种族的劳动者，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纷纷发动以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为诉求的立法运动；其二是在芝加哥，八位工人运动的安那祺主义者，因为 1886 年五月四日干草市场莫名奇妙的爆炸案，被借机判重刑，而导致全美工人运动的暂时受挫。1889 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工人会议，选定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者日，宣言在世界各地，只有工人才是人类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人的基本权利不容摧残，而芝加哥的干草市场事件是全世界工人在伸展社会正义的路途上的一个里程碑。宣言指出，工人可以被政府、大资本家、法院、新闻界、教会和军警联合围剿下倒下，“但总会有这么一天，劳动者会再度站起来，聚集了更大的力量，打倒一切不公不义，为全人类的未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 19 世纪中叶的芝加哥工人状况

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尤其是自 1860 年代的内战令后，美国即快速的迈向工业化道路。各种新能源、新机器的发现、发明与使用，南方强土的扩展等，使得美国的经济也由农业资本主义体制转向为以工商业资本为主导的体制。在这快速的转换环境下，芝加哥尤其显得突出。它在 1830 年代由还只是个蛮荒地区的小镇，到了 1880 年，却已成为全美工业重镇。在这短短 4、50 年中，它的人口每十年翻一倍，而它的经济活动也由商业、运输业及少数一些手工业，转型到现代大企业、大工厂。

¹⁵作者阿卫，原载于 1988 年五月号《人间》杂志，施明煌 2005 年 4 月 21 日放入网上<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0928subject/20020928-h006.htm>。编者略微修改。

快速的经济转型，带来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的重组。那些早一步在芝加哥占领地盘的一些萨克逊新教徒，借着巨大的经济转型，利用当时的廉价土地与劳工，为自己建立起巨大的资本主义式企业王国。像在屠宰业的奥默 P. Armour；农业机器业的麦孔米克 C. 麦克孔密克，印刷业的唐纳 R. R. Tornelly，及其他像：费尔德 M. Field、帕玛 P. Palmer 等家族。这些新兴工、商业的大亨，他们一方面控制了大部分生产工具；另一方面，也互相联成一气，对芝加哥的经济、政治、文化、军警有着无比的影响力。

相对于这些少数大亨的另一边，则是许多原本农家、小铺子的工匠、铁匠、木匠等人。他们在美国资本主义工业转型中，纷纷卖店或是倒店，而绝大多数沦为新式工厂的工人。这些工厂中的技术工、非技术工，成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做单调、重覆、简单的手工操作达 10 至 14 小时。而且他们的生活状况，据统计，即使每日辛苦工作十数小时，仍有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家庭负债累累。

另一方面，由于芝加哥在 19 世纪中、下叶是一个以第一代移民所组成的城市，在工人群中，土生土长的只占百分之廿四；其他部分则由日尔曼人、爱尔兰人、北欧人、波兰人等所组成，各民族工人有其自己民族的语言、宗教、文化；而且各民族工人有其自己特定的职业、居住地盘。再加上各民族工人间互不往来，互相竞争，更助长了大企业的优势力量；它们利用各民族间的矛盾，借机压低工资、增加工时，来夺取各族工人的更多剩余价值。即使真正有部分工人起来抗议，大企业家、工厂老板也会与政府、警察、新闻界联手共同围剿工人。

■ 从生活中学来的教训

但情况总不会一成不变的。芝加哥的各民族工人也逐渐由各种惨痛的生活、工作经验中认识到：各族工人间，虽然有语言、宗教、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们悲惨的工作、生活状况，他们处在受剥削的地位却是没什么两样。他们也开始相互捉摸、学习，学习成为一个联合的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奋斗。而这学习、成长的过程，主要又受到三方面的影响。

一、各种工人罢工、示威事件与军警的暴力镇压

在 1871 年芝加哥大火造成 250 人死亡、十万人无家可归。市民在饥寒交迫的状况下，引发了面包示威事件、1877 年的铁路大罢工事件、1884 年冬天穷人游行事件、1885 年的失业者抗议事件及车掌、驾驶员大罢工事件，在这些群众示威中，芝加哥的工人不分民族、技术、职位，皆遭到市内军警、法院无情的联手剿杀与镇压。但工人们在这些行动中也逐渐认清：各族的工人有相当的命运；官、商、警、新闻界全是联结在一块对抗工人的；工人们权利只有靠主动去争取，而不能靠施舍而得。在经过各种教训后，各民族工人在自己社区创立自己本国语文的报纸，而且也纷纷组织起自己的武装防卫，以对抗军、警的攻击与骚扰。

二、全美八小时工作标准日立法运动的扩大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东部一些城市的工人也曾推动十小时标准工作日的行动，但是并没有多大成效。内战后，八小时标准工作日逐渐成为各类工人在争取劳动者权利中的一项主要议题。他们主张在八小时工作之外，工人们有闲暇休息、娱乐、进修；而且也可帮助其他失业者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1867 年全美有六个州议会也曾立法通八小时标准工作日；1868 年国会也通过联邦雇员工作八小时的法律。但问题是：大部分有关工时的立法，并未能有其他法规而来保障其实现；另一方面，各大私人企业仍我行我素，钻法律漏洞，延长工时。

这期间最大抗争事件，仍然发生在工人众多的芝加哥。1867 年一万多麦孔米克工厂中的工人罢工，举行各类游行活动，来争取工厂工作每日八小时的合约。但由于当时失业者众、工人市场供过于求，而导致抗争失败，工人们仍回复到每日工作十至十四小时状况。

到 1880 年代初期，各地工人逐渐的认清：即使各州都订定八小时标准工作日的法令，但这法令如果要能真正的实现，还得靠劳动者主动权力的去推展；而且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不应只限是少数工厂工人权利；而是应普及全国各地劳动者身上。有鉴于此，于 1881 年成立的美加工会联盟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 & Labor Union of US & Canada (它于 1886 年改名为美国劳工联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在1884年全国大会上设立自1886年五月一日后，工人应有法定的八小时标准工作日；而且它也呼吁各地工人响应，在各地积极推动立法，得以在五月一日前，达成目标。自此之后，八小时标准工作日成为全美劳动者争取权利运动的一个焦点；而芝加哥也成为这运动的主要中心。

三、 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兴起

社会主义思想虽然在1850年代即随着大量欧洲的移民而进入芝加哥，但它真正在工人群众中普及起来，是在1880年代初。1880年在纽约、芝加哥的一些在社会主义者不满社会主义劳动党的保守作为而脱党另组社会革命会，它很快与许多在美国有惨痛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外国移民工人联络起来。在1883年匹兹堡举行的全国大会中，全美26都市的工人代表共同设立国际劳动者协会；其中，以柏尔森司、司柏司为主的芝加哥派的想法占主导：他们注意工会的组织力量、强调工人的自主行动。

国际劳动者协会在芝加哥，由于几位积极份子(柏尔森司、司柏司、失瓦伯、菲尔登等人)的推动下，快速的赢得当地工人的支持。1883年全市仅有四百名安那祺主义者；但到了1886年则有26个安那祺团体、2500名劳动者协会会员、及两万名以上的支持者。它们也出版共四种语言的八份报章杂志。

对八小时标准工作日运动，这些活动份子起初也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以为这是对资本主义工资体制的承认；但是当看到全国各地劳动者积极的卷入这运动，看到那大资本家、工厂老板悍然的反应之后，他们也积极参与，与劳动者共同朝这个目标奋斗。

那么，安那祺主义 Anarchism 又是什么呢？各种安那祺份子各有其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他们共同认为安那祺就是自由。他们也自认为是美国十八世纪独立运动，或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德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继承者。

八〇年代的安那祺运动领导人物莫斯特 Johann Most 曾说过：我遵守这四个使命：否定上帝、崇尚真理，所以我是个无神论者；反对

暴政、寻求自由，所以我是个共和主义者；弃绝私产、争取平等，所以我是个共产主义者；憎恨压迫、鼓动革命，所以我是个革命者。社会革命万岁！

柏尔森司在 1886 年大审中，也谈到他的哲学思想：“我是个安那祺主义者。…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让那些辛苦工作的劳动者有权自由、公平地使用那些生产工具，就是让那些生产者有权来享受他们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

也就是在上述的工人运动、集体行动与进步思想快速扩散的交错的环境中，芝加哥及全美的统治阶级终于借着干草市场事件，发动大镇压，以挫败这刚开始萌芽的劳动者的联合力量。

■ 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

1886 年一月一日这一天近了，全美各地的八小时标准工作日运动也更激烈地在劳动者间展开。各种罢工、示威、游行活动层出不穷，但这些仍不能震撼国会和议会，影响其订定法规。在五月一日这一天，全美各地数十万劳动者停工走向街头；在芝加哥也有九万人游行，运动能量一直持续下去。

在五月三日下午，德语的“工人报”主编司柏司应锯木工人的邀请，在麦孔米克工厂旁的布莱克街头向 6000 工人演讲。他呼吁工人联合起来，争取每日工作标准八小时的权利。在附近同时也有将近五百名在二月即被麦孔米克工厂借故解雇的劳动在工厂门口示威抗议。当下工铃响，一群被厂方微去取代罢工工人的代用工人走出工厂时，这群示威者即拥而上。在此同时，也突然出现 200 名警察，他们拿着棒子、长枪，向示威者打杀过去，总共造成 3 名示威者死亡、多人受伤。

司柏司在目击此事件后当晚，回到办公室中，写下传单，四处散发。他呼吁“劳动者！武装起来！”，对抗工厂老板及警察联手对劳动者的暴力迫害。他也同时呼吁五四日晚间七时三十分，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劳动者的抗议警察暴行大会。

由于筹备仓促，在四日晚间到达干草市场的人数总共没超过二千人；而且在延期一小时后，已有部分人离去。而且在司柏司、柏尔森司演讲完，费尔顿刚上台不久，即下了场大雷雨。因此，在十时左右，全场只剩二百名听众，而抗议大会也正准备结束。

芝加哥市长哈利生当时也在场，他也于十时左右离去。他到附近警察局，告诉帮非尔得警长：一切都很平静，所有待命警员皆可解散回去。但市长离开警局后，帮非尔得警长即率领 176 名武装警员，进军广场。他要求柏尔森司立即和平解散聚会。这时突然有人向警队中投掷一炸弹，当场死了一个警员，其他警员见此状况当场立即开火，群众伤者无数，四散逃逸。混战之后，又有 7 名警员死亡、多名警员受伤。

自五月五日起，全芝加哥进入了恐怖时期。各警队遂籍机大肆捕各种安那祺份子、工会领导和社区活动人士。他们到处破门而入、搜查各印刷厂、聚会厅及私宅；对无辜劳动者恣意搜索打，强逼他们作伪证。另一方面，芝加哥的各大报纸和教会也在相互唱和，大呼“法律与社会安定！”，而且要求严厉惩罚工会人士。全美各地也出现类似的恐怖活动。伊利诺州检查官格林烈尔也宣称：“先搜捕，以后再谈合不合法！”

到五月二十七日，共有 31 位工会领袖、劳工报纸编辑、社区活动份子等被起诉“阴谋叛乱罪”及“凶杀罪”。但是在经过一翻过滤、收买后，共有 8 名安那祺主义者受审：司柏司、林格、非尔登、斐失儿、恩格尔、尼伯、失瓦伯及柏尔森司。

大审自 1886 年 6 月 21 日在库克郡犯罪法庭展开，当时只有 7 名被告在场。这次陪审团成员的挑选不是像往常程序一样经抽选产生，而是法官特别指定一人，而由这人自己去组织陪审团。这其中有的还是爆炸案中死亡警员的亲属。正当审判即将开始之际，失蹤、逃逸了几个星期的柏尔森司突然走进法院，他向法官说：“我自愿来这儿，与我的同志们一起受审！”

八位被告的辩护律在庭上指出：（一）并无任何证据能证明被告中有任何一人曾在当晚投炸弹；（二）被告人也没任何预谋在当晚制造任

何暴力事件，因为柏尔森司把自己太太及两个小孩都带去了；（三）连芝加哥市长都曾指出当时的演说十分和平，并无任何煽动言词；这八名被告中，只有三名当晚曾在现场出现。但是检查官格林烈仍控告他们以言词煽动暴力，而且说他们“八人小组企图阴谋叛乱”。

■ 心灵的烈火

在八月廿日，审判定案：八名被告中，七名被判死刑，尼伯被判十五年。在之后三天的被告回辩中，司柏司开始他的辩词：“在这儿，我是以一个阶级的代表身份向另一个阶级的代表讲话”。他拒绝接受“谋杀”、“阴谋叛乱”罪，他指控政府正利用干草市场事件来铲除劳工阶级的领导人物，而且资本家也借机来压制八小时标准工作日的工人运动。但是，司柏司指出，这种借机压制的阴谋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如果你们以为把我们统统绞死，你们就可压住劳动者运动，……压住那被践踏的几百万劳动者，那救赎几百万生活在贫困、而又辛若工作的工人运动——如果你们真认为能压得住，那么就绞死我们吧！你们在这儿，只是把一点星火给压了下去；但是，在你们的前面、后面、左方、右方，烈火到处在烧着，而且这是劳动者心灵之火，你们永远也扑灭不了。”

■ 永远压抑不住的声音

这个案子在 1887 年三月上诉到伊利诺州最高法院。于九月十四日给驳回，维持原判。十一月二日又再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被拒绝受理。

绞刑的日子定在 1887 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联邦法院拒绝接受此案件的同时，各地请求特赦的运动纷纷展开。全美各地劳动者举办各种抗议聚会，成千上万的请赦信纷纷寄出；连美国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像美国劳工盟主席巩帕斯、参议员、美国法律协会、法官等也纷纷向州长伊利诺请赦。另一方面，这次审判结果，也引起欧洲各界的注意。著名文学家萧伯纳、王尔德在英国发表演讲，巴黎市议会也致电表示关注；另外在荷兰、法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劳动者纷纷解囊，来支助救援行动。唯一例外的是德国的俾斯麦首相，他担心干草市场事件会对德国工人有不良的影响，而下令停止任何公共聚会。

十一月十日伊利诺州长奥格利比在巨大的压力下，赦免费以顿、失瓦伯死刑，而将之改为无期徒刑。另外，林格在同一日被人发现离奇地在嘴中塞下炸药，自爆而死。

终于到了十一月十一日，全芝加哥军警全部出动、戒备。在中午，四位受难者走向绞刑台。斐失儿在台上说：“安那祺万岁！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柏尔森司说：“人民的声音，是永远压不住的。”司柏司则说道：“我们的怒吼在目前是给他们镇压下去，但总有一天这镇压后的沉寂将会引爆出千万倍的力量。”

五位受难者的出殡仪式是在十一月十三日举行。芝加哥聚了四、五十万人的追悼及送葬行列。在各劳动者住宅区的建筑，全部挂满黑布。五位受难者终于在芝加哥西边森林公园的华德汉公墓安息。而他们的纪念碑与雕像也于1893年在一些劳动者协会的支持下，矗立起来。

至于三位仍在牢狱中的受难者，他们在新任州长奥尔盖尔德上任，重新调查此案之后，于1893年六月签署特赦而释放出来。奥尔盖尔德州长认为这八位人士本来就无罪，他们只是政治审判的受害者；而且这审判过程本身就不公正。

另一方面，随着八人的审判，美国工人的八小时标准工作日运动也为之受挫。等到两年后，美国劳工联盟在圣路易召开全国大会时，才能再度开始推动。大会决定全美劳动者共同努力在1890年五月一日完成八小时标准工作日的立法。

1889年七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劳工会议决定1890年的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在此日全世界各处劳动者将举行各式争议八小时标准工作日游行，争取民主和劳工权利的群众大会，以声援美国的劳动者，同时也纪念芝加哥的干草市场事件受难者。

1890年五月一日，全美及欧洲各地的劳动者举行了各种聚会与示威，争取在世界各地都能在法律上确定八小时标准工作日。在工人运动宣言的序言中，这样提到这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劳动者日：“今天，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

员成为一支队伍，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今天的情景一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 结语

干草市场事件及其所发动的国际劳动节迄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美国政府对这事件及劳动节是如此的敏感，而合图将它淡化、或完全将它由其历史中抹去；而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利用劳动节控制国际劳工运动史、歪曲埋葬了干草市场悲剧中为之献身的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理想。

当然，只要人类社会中仍有压迫、剥削、财富过分不均，仍没有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世界各地的劳动者，就会在每年的五月一日春光明媚的国际劳动者节举行游行、聚会，反对战争、法西斯、独裁、核武装等犯罪；争取民主、人权、自由等。干草市场悲剧作为世界各地劳动者反压迫、争正义的精神象征，显示劳动者才是社会财富真正的创造者。全世界的劳动者不会忘记干草市场事件的历史教训，紧密、坚强地团结起来，开创人类社会更自由、平等、公正、人道的新纪元。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司法冤案¹⁶

1886年发生在美国的“芝加哥干草市场案”，又称为“干草市场事件”。它不仅是美国工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工运史上的一面旗帜。1889年7月，在有2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通过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在每年的5月1日，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在一切国家和一切城市，劳动者都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从法律上把工作日限制在8小时以内。确定这个日期就是为了纪念美国芝加哥工人在1886年5月1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斗争。

罢工与集会

1886年四月，美国的一家工会积极准备在5月1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全国总罢工。5月1日，全美多个城市同时举行罢工，包括纽约、底特律、密尔沃基等城市，但这次工人运动的中心是在芝加哥。芝加哥城估计有4万人参加罢工，8万人参加游行。全美罢工工人的总数估计有30到50万人。艾伯特帕森（Albert Parsons）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国际劳动者协会”这一组织的创始人。5月1日，帕森和他的妻子及孩子们一起，带领着8万人的队伍沿着密歇根大道游行。5月3日，芝加哥罢工的工人们走到了麦考密克联合收割机厂附近。当时麦考密克联合收割机厂已经雇用了一批顶替罢工工人的人继续工作，同时有400名警察保护这些人。在5月1日总罢工的当天，虽然有一半的顶替者投身到罢工的队伍中，但还有一些工人未参加罢工。罢工的工人们在麦考密克联合收割机厂的外面举行了一个集会，奥哥斯特斯比斯（August Spies）发表了演讲，倡议工人们“团结起来，支持工人联盟，争取成功”。总罢工活动由于计划周密、调整及时，从开始以来一直未出现暴力活

¹⁶ 宋冰，5/18/2009，“中国政治发展”首发

<http://www.politicalchina.org/NewsInfo.asp?NewsID=148773>（中文没有注明英文来源，编者没有联系到作者，文中译名也没有改变。）

动。但是，当下班的铃响起后，一群罢工工人不顾斯比斯的劝告，突然向工厂的大门涌去，警察立刻向人群开枪，两名麦考密克厂的工人被打死（另有报道说是6人）。

警察的暴力引起了工人的愤怒，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迅速印制传单，号召第二天（5月4日）在干草市场广场集会，干草市场是芝加哥的集市中心。这些传单用英文和德文两种文字印刷，向市民通告警察的开枪行为，号召工人起来维护正义。第一批传单上赫然写着：工人们武装起来展现我们的全部力量！当斯比斯看见这行字时，他坚决要求取消这句口号，否则他就不在集会上作演讲。很快，大部分传单都被销毁了。新印制的2万多份传单撤掉了这句口号，被大量的散发到市民的手中。

5月4日傍晚，天下着小雨，干草市场的集会平和地开始了。奥哥斯特斯比斯站在一辆四轮马车上对人群演讲，大批的警察站在附近监视，一名历史学家记下了斯比斯的演讲内容。他讲道：“传闻说这次集会的目的是要拉开暴动的序幕，是为所谓的军事准备做动员，然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从一开始，这个集会就并不提倡任何这样的目的。这次集会，是要告诉大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总形势，和在这个运动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几名工人运动的领导轮流对人群作讲演，集会一直都很平和，以至于市长都停止了监视早早地回去了。塞缪尔菲尔德恩（Samuel Fielden）是最后一位讲演者，他在10点半时结束了演讲。警察命令集会解散并开始向讲演者的马车围拢过来。这时，一枚雷管炸弹扔进了警察的队伍里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了狄根（Degan）警官。警察们立即开枪，据说有一些工人也带着枪，这次枪击持续了最少5分钟。除了狄根外，还有几名警察被炸伤，但是绝大多数伤亡的警察都是被子弹打的，是警察之间的误伤。一位警察告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很多警察是被自己人的左轮手枪打伤的。每个警察都要保护自己，一些人逃到了广场的外面，其他人打光了他们的子弹。”至少有4名工人被打死。伤亡的普通市民无法统计，很多人因为害怕被逮捕，不敢去治伤。

被预选的陪审团

随之而来的是大搜捕，8名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被逮捕并以谋杀罪被起诉。八名被告人，其中包括上文提到的帕森、斯比斯和菲尔德恩，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23岁；5人出生在德国，1人出生在英国，2人出生在美国；其中有5人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但当炸弹爆炸时只有2人在现场，另3人提前离开了；8人中有3人并未参加干草市场的集会。

根据美国宪法，被告方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当被告提出由陪审团审判时，这让公诉方感到很被动。因为所谓谋杀案的证据并不充分，而且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工人运动高涨，若由一个随机挑选出来的、真正公正的陪审团审判，很可能对被告作出无罪判决。政府为了避免这种冒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对陪审团进行牢牢的掌控。当时，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法院和大企业主的手中，要把陪审团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不可能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挑选什么样的人组成陪审团。

1886年6月21日，法庭正式开庭，第一个步骤就是挑选陪审员，这花费了三周的时间。在挑选程序中，控辩双方对每位候选人都可行使“有因回避”和“无因回避”的权利，“有因回避”没有名额的限制，但是否回避需要法官作最后决定。“无因回避”有名额限制，针对每个被告人，双方各有20次的“无因回避”权，无需法官的同意。换句话说，控辩双方对八名被告共享有160次的“无因回避”权。

在挑选的第一周，最初被召集的陪审员候选人全部落选，主要是因为被告方的反对。这时，本案的法官加里并没有随机地去抽选候选人，而是采用了一个在实践中很少使用的作法，即派有控方倾向的司法官去预选陪审员候选人。加里特别指派一名叫赖斯（Ryce）的法警去预选候选人。这名狂妄的法警在预选陪审员时告诉他们“我负责这个案子，那些家伙（指被告）肯定要吊死”。他自己在事后吹嘘说，在预选时如果发现某人对“被告有罪”表示冷淡或反对，他自然不会挑选这样的人。通过预选的方法，赖斯有意的把那些“想吊死那些家伙”的候选人送进法庭。一位落选的候选人在被告将被执行死刑

的前四天，写了一封书面的证词给当时的州长，证明赖斯确实说过上面的话，他还写道：我愿意作证，不是因为我同情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因为公民有维护法律公平的义务。

让我们来看看赖斯预选出的这些候选人吧。一位候选人在被询问时说：“我觉得那些人是有罪的，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罪。从报纸上的大量报道中我有了这个印象。现在法庭应该拿出一些积极的证据，让我认为这些人是无罪的。”他的思维逻辑是假定被告有罪，完全与“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背道而驰。当被告对该候选人申请“有因回避”时，却被法官否决，被告方不得不使用“无因回避”排除这样的候选人。

另有二位毫不掩饰自己偏见的候选人，最终被公诉人和法官选进了陪审团。丹克尔（Denker），27岁，商店送货员。公诉人问：“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你有明确的态度吗？”答：“是的。”问：“这种看法会妨碍你对本案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吗？”答：“我想会。”问：“如果你成为陪审员，你否能根据证据对被告作判决而不考虑你的任何偏见和意见？”丹克尔终于明白了这个暗示，回答：“我想我能。”法官对这种有明显偏见的陪审员并没有多问什么，只是重复了一下公诉人最后的问题。很明显，丹克尔正是公诉人和法官想要的那种陪审员。另一位是森福德（Sandford），25岁，铁路票务员，曾经在纽约当过石油经纪人。当被问道是否对被告有偏见时，森福德回答：“这是肯定的。”公诉人只好引导说：“如果你当了陪审员，不管你有什么偏见，你都能够根据证据作出一个公平、公正没有偏见的判决吗？”森福德回答：“是的。”他又入选了。这时被告方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无因回避”的名额，只好无奈的接受这个陪审员。

在挑选过程中，加里法官总是支持公诉方的“有因回避”而否决被告方的“有因回避”，以至于被告方不得不更多的使用“无因回避”的名额，其后果就是当被告方用完了“无因回避”的名额时，不得不接受一个有偏见的陪审团，此时的公诉人只使用了52个“无因回避”的名额。

三周的挑选，共有 974 名候选人被审查，其中 750 人被“有因回避”，212 人被“无因回避”。被告的辩护人提请法官注意这个事实，赖斯预选的候选人局限于职员、商人和工厂主，没有一个工人。但加里法官拒绝考虑辩护人的反对意见。

法官的逻辑

自干草市场案件发生后至今，世人仍不知道是谁扔的那枚炸弹。从现有的证据看，八名被告与炸弹事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炸弹爆炸时，8 名被告中只有 2 人在集会上，这 2 个人正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下演讲的马车。

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加里对陪审团作了这样指导：本案提起公诉的原因在于被告已经进行了劝告和鼓励谋杀的行为，如果谋杀行为因劝告和鼓励被实施，那么给预劝告和鼓励的人就是谋杀犯罪。他还告诉陪审团：间接证据是一种与所指控的犯罪活动的背景和某些事实有关的证据，如果那些证据让陪审团在超越合理怀疑之外认为被告有罪，那么陪审团就可以认为被告有罪。当被告方要求向陪审团澄清“哪些证据属于效力应该被怀疑的证据”时，法官予以拒绝。更难以置信的事，加里法官甚至告诉陪审团，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是法律的法官，就像他们是事实的法官一样。这是暗示陪审团可以使现行法律无效。因为用间接证据定罪并不符合法律的宗旨。法官的法庭指导令陪审团困惑并且不知所措。

当有罪判决作出后，被告要求重新审判，理由是陪审团拥有偏见，法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犯了谋杀罪，无法证明被告是罪犯的同谋者。加里法官用他的逻辑驳回了被告的要求：判决并不认为被告以任何具体行为参与了谋杀事件，但判决同意这样的理由，被告通过演说和散发传单，鼓动大量的人而不是个别人从事谋杀行为，有日期、时间和地点，这已经埋下了隐患。鼓动的后果是某个我们不知道的人，受鼓动的影响，扔了炸弹，炸死了警察。鼓动者就是谋杀犯罪。

面对法官加里的逻辑，后来担任伊利诺州州长的约翰·奥盖尔德（John P. Altgeld）在《释放原因书》中写道：“在政府被人民供

养的历史上，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从未有过法官立下过这样的规则。”

判决、执行与释放

1886年8月19日下午3点半，陪审团退出法庭评议。他们被要求尽快地做决定，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八个被告大堆的证据。陪审员们是考虑了法庭的指导还是考虑了自身的责任，不得而知，但当天陪审团并未作出判决。8月20日上午8点半，一千多人聚集在法院前面。每一个走进法庭的陪审员看起来都很严肃，被告们似乎感觉到了判决的内容，脸上隐隐现出焦虑。十点整，法官加里在法庭上宣布：所有旁听的人，除了法庭人员外，必须原地就座，每个人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他转向陪审员：先生们，你们做出判决了吗？陪审团的主持人回答：我们作出了判决。他递给法庭人员一张纸。法庭人员读道：陪审团裁决被告人奥哥斯特斯比斯（August Spies）、艾伯特帕森（Albert Parsons）、阿道夫斐失儿（Adolph Fischer）、乔治英格尔（George Engel）、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迈克尔施瓦博（Michael Schwab）、塞缪尔菲尔德恩（Samuel Fielden）犯有谋杀罪，起诉书的指控成立，判处死刑。陪审团认为被告人奥斯卡尼伯（Oscar Neebe）犯谋杀罪，起诉书的指控成立，判处15年监禁。

对于陪审团的有罪判决，被告向伊利诺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州最高法院的七名法官并未对加里牵强附会的理由提出任何质疑，也未责难加里对“合理怀疑”原则的不屑，反倒作出了一个长达267页的意见书，来解释他们维持原判的理由。随后，被告请求联邦最高法院调卷审理，1887年10月27日，联邦最高法院拒绝调卷审理，理由是该案的问题不属于重大的联邦问题。联邦最高法院也拒绝了有四万人签名的请愿书。

死刑执行前，当时伊利诺州州长欧格斯柏（Oglesby）迫于各方压力，试图把被告的死刑减为终身监禁，但要求被告必须写一份道歉书。帕森、斐失儿、林格和英格尔拒绝了这个要求。斯比斯、菲尔德恩和施瓦博写了请求书，但三天之后，斯比斯撤回了请求，他写信给州长请求只绞死自己一人以免除其他人的死刑。最后，州长仅给菲尔

德恩和施瓦博做了减刑。1887年11月10日，在执刑的前夜，林格这个年仅23岁的年轻人，在自己的牢房里用偷带的自制炸药含在嘴里自杀，于次日下午死亡。1887年11月11日中午，四名被告被绞死。据目击者说，因为他们颈上的套索系得太松，并没有立刻死亡，挣扎了大约8分钟。

1893年，伊利诺州的新任州长奥盖尔德对该案作了大量的调查，写了一份万言的《释放原因书》，无条件的释放了该案被关押的3名被告菲尔德恩、施瓦博和尼伯。在《释放原因书》中，奥盖尔德质问为什么陪审团要被预选？被告有罪的证据在哪里？法官是公正的吗？为了纠正这起司法错案，奥盖尔德付出了他的政治前途。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真相被不断地揭露出来。连法官加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法庭指导是与所有的法律判例相反的。但他找到了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这个案件是“史无前例”的，它需要法官做一个“史无前例”的法庭指导，他自己只是“执法过于严格”。今天，芝加哥干草市场案件已经被定性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司法错案之一。这起审判也成为陪审团审判史上的污点，在美国国内被作为反对陪审团审判的经典案例。关于此案的方方面面，世人至今仍在评说。

透过这起案件繁杂的、冗长的法律程序，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背后各种政治力量的争斗。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正是社会关系处于剧烈的变动时期，政治赤裸裸的裹挟着法律。当时美国社会的政治背景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大工厂主、大资本家，他们害怕劳工运动，用手中的钱勾结政府官员、司法官员和警察，想方设法破坏、瓦解甚至镇压劳工运动。他们通过钱和权把法律变成了一套“政治的晚礼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加里法官会抛弃法律逻辑而是用他自己的逻辑来解释法律，为什么伊利诺州和联邦两级最高法院的15名法官，这些“权力和智慧”的拥有者们，面对来自数万人的请愿书、申诉书和质询书时，他们会堂而皇之的以“法律程序正当”、“此案不涉及重大联邦法律问题”维护一审判决，其实质维护的是大工厂主和大资本家的利益。

社会的前进、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绞索阻挡不住劳工运动的蓬勃发展，1938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劳动时间标准公平法案》，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但是，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一些有权有势者，他们会假“法律”之手来维护一己私利，甚至不惜损害人民的利益。政治制度有民主与专制之分，法律有良法和恶法之别，执法者有公正与枉法之差，我们不能不警惕，历史的冤案会再次发生，历史的悲剧会再次重演，如何让民主政治与良法结合，再选出公正的执法者，这是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仍然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部 自由血

一 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 殉道后的四十年

一 殉道者的祭坛前

社会的进步是一部殉道的记录。人类进化的每个时代中都浸透着殉道者的热血。大刀下、枪弹下、绞绳上、十字架上、断头台上、电椅上，在那里，古今来不知有若干的“好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从野蛮的“过去”到所谓文明的“现在”，这期间总是重演着同样的惨剧。世界上最惨酷的事更没有胜过人们对于他同类的虐待了。除了大批的屠杀，零碎的宰割而外，还有许多人被活埋在监狱中，被活埋在“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为什么呢？

人类确实是在不断地进步的，然而人类的大多数却又害怕进步。人类崇拜超时代的先驱者，然而人类又害怕这些先驱者。所以向前进的人们最初总是受着一般人的仇视，而每一次的进步总是受着大多数人的阻碍（二十世纪的灿烂的文明在前世纪的人们看来何尝不是妖魔的世界）。先加以威吓，后继之以屠杀。超时代的先驱者中谁能逃出这样的命运？死了的耶稣受人崇拜，而活着的耶稣总是受人虐待；这是多么矛

盾的可悲的一件事啊！

我们计算着：这许多年来为了人类的进步不知有若干的殉道者流尽了他们的热血了。他们的血不断地流，零碎地流，流了无数的年代，现在已积成了一个小小的血海。总有一天这血海中的波浪会冲上岸来，把一切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冲倒，洗出一个新鲜的世界！

将来到了那一天的时候，自由平等的社会实现的时候，历史会把我们这些惨苦的年代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后代的。他们会来嗤笑他们祖先的愚蠢，然而对于那些为人类幸福而死的殉道者，他们却是极其感激，极其尊敬的。只有我们的后代才是最好的裁判者！他们会来裁判我们的一切！

我们，生活在这些惨苦的年代中的我们，将怎样的被后代裁判呢？这在我们是无从推测的。然而在殉道者的祭坛前，在支加哥惨剧过了四十年后的今日，我们当明白向前进的道路了，我们当明白我们现在所应做的工作了。在我们的后面有黑暗惨痛的“过去”，在我们的前面有光明灿烂的“将来”，难道我们还应该徘徊在泥泞的狭道中么？殉道者的光荣的一生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今天，在支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四十年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在黑暗的泥泞道中徘徊，我们不应该再在殉道者的祭坛前悲哀。殉道者的身躯虽已在黄土中长埋，而他们的精神却将永远存在。真理是不死的，正义是不灭的。宣传真理、为真理奋斗的人是终于会得胜的。记着这个，我们不顾一切地向前猛进罢！我们是会得着最后的胜利的。

二 一件渺小的祭品

伟大的殉道者：在你们殉道后四十年的今日，在你们的祭坛前，我们呈献上这一件渺小的祭品，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我们不曾生活在你们殉道的日子，也不能从绞刑台上夺回你们的生命来，我们是你们在遗书中所说的“未出世的孩子”。在我们尚未出世的时候，你们便为我们的幸福而昂然地走上了绞刑台，我们得着你们遗留下来的这点荣光，而得认识真理和正义，而得生活在光明的理想世界中，不致坠落在黑暗的地狱里与吃人的畜生为伍。我们是被压迫被虐待的人，在这强权的世界中我们曾被“人”像狗一般地屠杀和囚辱。然而得着了你们遗留下来的这点荣光，我们也能够鼓起勇气，赤手空拳像狮子一般地去打那些吃人的恶魔了。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想激起我们的高贵的感情，常常兴奋地向我们说：“孩子，你长大的时候，你要爱真理、爱正义，你要做一个好好的人！”然而他们不曾告诉过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从听了那样兴奋的话以来，我们也就抱了最大的决心去寻求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真理和正义了。不幸在这强权的世界中，对于人们的最可怕的东西再没有过于真理和正义的！很多年以来，我们受了人们的骗，跑到退后的路上为强权者和野心家张口；很多年以来，我们因为坚持着寻求“真实的”真理和正义，不肯相信那冒牌的东西的缘故，竟被恶魔畜生屠杀或活埋了。最后由于你们，你们的殉道，我们才得到了我们寻求了

一生的宝贵东西，从此我们的冰冷的心中才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我们的杀得死的身躯中才有了杀不死的精神。从此我们真正地知道而且痛爱真理和正义了！在我们父母的坟墓前，我们兴奋地祷告说：“你们的孩子现在是在爱真理爱正义了！”然而在你们，——伟大的殉道者！——我们的“永久的父亲”的祭坛前，我们（你们的“未出世的孩子”）将怎样地祷告呢？假若你们现在还能够说话，我们相信你们的答复一定是：“我的孩子，爱真理罢，爱正义罢！”

吃人的畜生因为不能压下你们的声音，他们便来噬杀了它，因为不能冷却你们的热情，他们便来停止了它；因为不能收买你们的生命，他们便来杀死了它。然而结果他们仍缙不住你们的声音，冷不了你们的热情，杀不死你们的生命。

现在，四十年后的今日，你们的声音更响亮了，让我们也来同样的高叫罢。我们这件渺小的祭品不仅把你们的声音很广地传与后代，假若你们还有知觉的话，从这里面，你们也可知道你们是怎样的映在你们的“未出世的孩子”的眼里，而且也可以听得见我们的呼声了。柏尔森司在殉道时叫着“让民众的呼声起来罢”。现在我们是在叫了！

三 一八八六年芝加哥的“五一”

一八八六年可算是美国工业界最混乱的时期。在美国，自一八三二年以来，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常在各地发生，直到一八七八年八小时制才被国会通过。工人用很大的牺牲争得

来的八小时制的法令，不过是一纸具文，在工厂内并没有实行。这样自然会激起工人心中的怒潮。一八八四年十月，美国及加拿大的劳动组合与职工联盟在芝加哥开会决定采用直接行动，并议决若到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八小时制尚未实现，则于五月一日这一天举行总同盟罢工。这一次资产阶级总算是屈服了。然而在这一年，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斗争却是一天比一天的激烈，“劳工组合”的会员大都被资本家辞退而失业了。双方都在秣马厉兵，准备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大大地决斗一下。在这种黑云密布，势将降雨的时候，天空中忽然起了一阵雷声，霎时风雨大作。这雷声就是麦可米克工场（Mc Cormick Harvester Factory）的工潮。于是劳资间的血战开始了。

芝加哥麦可米克工场在这年二月里无故开除工人一千二百名，因此发生了罢工潮，双方条件相差甚远，久无解决办法。被开除的工人于五月二日开会商议对付方法，柏尔森司（A.R. Parsons）与失瓦伯（Michel Schwab）曾到会演说。第二日（五月三日）搬运木料工人组合又在麦可米克工场附近开会，讨论恢复工作的条件。司柏司（August Spies）亦到场演说。在四点钟时，那些在工场里私自上工的工人放工出来了，于是一部分的群众便向他们走去，当时有少数人掷了几块石子，双方便发生小的冲突。不久大队的警察到场，向群众开枪。群众凭着一股勇气赤手空拳地和蛮横的警察相搏战，立刻死六人，伤无数。自然死者都是群众这方面的，那些有枪的“狗”能被赤手的妇女小孩打坏么？不会的。

四 阶级战争已经开始了!

司柏司目击着这样的惨剧激动到了极点。回到报馆里(他是德文报《劳工新闻》的编辑)用德文和英文写下了有名的“复仇檄文”,印成传单散发。“复仇檄文”四个字是排字工人加上的。司柏司在事前并不知道。

工人们! 武装起来!

今天下午你们的主人派遣他们的走狗(警察)杀了你们的六个同胞在麦可米克工场前面了。他们杀了这些可怜的穷人,因为这些人正和你们一样有勇气来反抗主人的命令;他们杀了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敢于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他们杀了这些人,是要向你们(自由的美国国民)表示,叫你们必须以他们所给你们的东西为满足,否则你们也是要被杀的!

这许多年来你们已经忍了很大的侮辱了;这许多年来,你们已经受了无限的苦痛了;你们作工,把自己的生命也要作尽了;你们挨饿受冻也已很久了;你们的孩子也被工场的大口吞下去了,总之,你们已经做了忠顺的可怜的奴隶,而且做了无数的年代了。为什么?为的是要满足那一般懒惰的强盗似的主人之无厌的贪欲,装满他们之无尽的财库!当你们向他们要求减轻你们的负担时,他们便派遣他们的走狗来枪毙你们,屠杀你们!

假若你们还是一个人，假若你们还承认是那些流了血来争回你们的自由之你们祖先的子孙，你们便要起来，用你们的全力打倒那正在吸你们的血液的魔鬼！

武装起来，我们请求你们，武装起来！

你们的弟兄们

屠杀事件发生的第二日（五月四日），失瓦伯在《劳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是：

阶级战争已经开始了！许多工人昨日在麦可米克收割工场前被枪击死了！他们的血正在那里叫喊复仇！现在万不可迟疑了。一群如鹰似虎的军警正要喝我们的血呢！然而工人们并不是一群任人屠杀的驯兽。白刃临头，红血相报！宁可为争自由而死，不可在痛苦中苟且偷生！既是他们以枪炮对待我们，我们也要使他们永远不能够安宁。在现在的情形中，我们也应该武装起来了！昨天晚上正当许多寡妇哭她们已死的丈夫，许多小孩哭他们已死的父亲时，富人们正在他们的高楼大厦里，举酒狂欢庆祝胜利呢！妇人们！孩子们！擦干你们的眼泪；奴隶们！都起来罢！暴动呀！革命呀！

读了这篇浸着血泪，燃着愤怒的檄文，谁能不被感动呢？

五 草市场群众大会

五月四日的上午，又出现了下面的传单，

工人们注意！今晚七点三十分，在德里勃林与好司台特间的南道尔夫街的草市场(Haymarket)开群众大会，抗议昨午警察枪杀我们工人的暴行，并有著名演说者到会演说。

执行委员会

然而这次大会一直到了这晚八点半钟才开始。到会的人据当时报纸的记载有一万余人，但事实上只有几千。一辆小货车做了演讲坛。司柏司是第一个演说者。柏尔森司这天早晨刚从星星拿底回来，不知道群众大会的事，这晚他和斐尔登等正在《警钟》报馆开会。司柏司叫人来请他和斐尔登去演说，他和他的妻子小孩等都去了。司柏司演说完毕后，柏尔森司便继续着演说，其次就是斐尔登的演说。柏尔森司因这时空中乌云密布，怕要落雨，便带了他的两个小孩同他的妻子离开了会场。

这次的大会是很和平而且很有秩序的。芝加哥市长哈利生八点半钟到场，直等到十点钟才离开，他又到警察局去向警察长帮菲尔得说这次会议中不会有轨外的行动，不必去干涉。后来他在审讯的时候，并证明那天晚上并没有一个演说者暗示着对于任何人施用暴力，并且没有看见什么人带了武器到场。

到会的人众渐渐地散了，斐尔登已决定在数分钟后便宣告闭会了。忽然帮菲尔得领了一队带着手枪的警察共一百八十人跑步到了会场，下令立刻解散这次集会。长官向斐尔登

说：“奉伊立诺伊州政府命令来解散你们。”斐尔登回答说：“我们这次集会是很和平的，”说完便走下讲坛。帮非尔得不再说什么，转身就发令开枪。在混战中，突然从旁边巷子里抛来了一个炸弹，落在警察队里。立刻死了一个警察，还伤了几个。于是血战便开始了。司柏司的兄弟也受了重伤，群众中受伤的不计其数。

六 畜生们的乱咬狂吠

芝加哥的政府当局大起恐慌，在草市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日（五月五日），吃人的畜生们便开始乱咬狂吠。这天早晨司柏司在《劳工新闻》报馆被捕，失瓦伯和斐尔登也被捕了。失瓦伯那天并未到会。司柏司和斐尔登当炸弹爆发时虽在会场，但和炸弹事件并没有丝毫关系。《劳工新闻》的排字工人斐失儿（Adolph Fischer）在这天下午被捕了。然而警察还不甘心，逐日搜索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动运动者的住宅，封禁报馆。恩格尔（George Engel）、塞利格尔（W. Seliger）、林格（Louis Lingg）也陆续被捕了，他们并未参加草市场大会，但在林格的屋子里寻出了制造炸弹的药品及器械来。尼伯的被捕是偶然的。五月五日两个侦探到《劳工新闻》报馆，看见了尼伯便问他，谁是《劳工新闻》的主笔，尼伯回答说：“司柏司和失瓦伯被捕后就由我来负责。”于是他也被逮捕了。

柏尔森司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法庭曾悬赏五千元缉拿他，警察局派出许多侦探四处密访；还有失瓦伯的亲戚雪老

柏尔特(R. Schnaubelt)也没有被拿着,那些“狗”的嗅觉虽灵敏,也嗅不出一点儿踪迹来。

七 法庭公然受贿

在审讯之前,便开始选择陪审官。陪审名录中虽有千余人,但只有五六个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被召集的人一个个发表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及劳动运动的偏见,说他们一定可以判决被告席中那些无辜的人的死罪。那个选定陪审员名单的特别捕役曾宣言:“这些人(指被告)应该绞死。”到后来十二个偏见最深的人便被选出来做陪审官。

五月二十五日法庭以谋杀警察狄更的罪名提起公诉,控告司柏司、失瓦伯、柏尔森司、斐失儿、斐尔登、恩格尔、林格、尼伯、雪老柏尔特、塞利格尔十人。六月二十一日,这次最早鄙的审讯便开始了。而且法庭公然受贿。资本家的报纸上开始为十二个陪审员募集款项。三百个领袖资本家所组织的芝加哥公民联合会也募集了十万元来报酬法庭,对于警察厅,他们也允许在裁判后每年以十万元作报酬,五年间他们实际上担任了四十八万五千元。

八 柏尔森司的自首

六月二十一日法庭开始审讯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自投罗网的人,他爱真理、爱正义胜过爱他的生命。他明知资本家

和政府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他却不怕。他愿慷慨激昂而死，不愿苟且偷生。这个人便是柏尔森司。

当草市场炸弹爆发时，柏尔森司在柔夫厅(Zepf's Hall)里正立在窗前看外面的景象。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同志何尔门斯夫人(Mrs.Holmes)离他也不远。他听见了炸弹的声音便跑到他妻子的身边，安慰她们说：“不要害怕！”这时枪弹乱飞，很多人从外面逃进厅来。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过了一阵，秩序稍恢复了一点，他们便出去了。他们是预备回家的。在路上何尔门斯夫人对柏尔森司说：“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冲突。所有的人都晓得你，他们晓得你在劳动运动中很有势力。要是我们的同志有了危险，你一定跑不脱的。不管怎样，至少你应该暂避几天。我们现在还不能听随你去牺牲。而且在这激动的情形之下，我们不晓得他们会拿什么手段来对付你。”柏尔森司说：“我并不以为我应该走开，——你果然这样想么？”何尔门斯夫人又说：“是的，你暂避几天并没有什么害处；你且暂时到一个较安全的地方去，等到你觉得这里需要你的时候，你再来好了。”柏尔森司还不以为然，他和何尔门斯夫人辩论了许久，最后他听了她的话。他身边没有多的钱，一个朋友布朗借了五元美金给他。他便和何尔门斯夫人一起去西北车站；而柏尔森司夫人独自回家。柏尔森司并不说什么话。在车站上，他又问何尔门斯夫人一次，她是否真以为他应该离开芝加哥。临行因为他的妻子在家没有钱，他把他身边仅有的钱分了一半，请何尔门斯夫人交与他的妻子。

六月十八日，柏尔森司夫人突然来到被告律师商议事件的地方，说她的丈夫这时在威斯康辛州的屋开夏(Waukesha)，在那里他是很安全的，但他觉得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愿意来法庭自首，他问他的妻子和律师们的意见如何，因此她便来和律师们商议。律师中布拉克大佐极力赞成柏尔森司自首，沙罗孟表示同意。发斯脱尔却极端反对，他以为柏尔森司的自首除了牺牲自己外，并没有一点别的好处。柴司奈因为不熟悉美国情形，便没有表示意见。然而柏尔森司夫人却和布拉克同意，赞成她的丈夫自首。

柏尔森司二十一日早晨八点三十分到支加哥，下午两点钟便到法庭自首了。情形是这样的：

这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布拉克大佐在法庭门口的石阶上踱来踱去，像等候着什么人似的。几分钟后一辆马车来了。一个女子和两个男子从里面下来。布拉克大佐默默地和那一个带着庄严和聪明的面貌的黑发男子握了手，并且挽着他的手向里面去了。在旁边的一个人问道：“和布拉克一起的人是谁？”一个新闻记者说：“我相信这是柏尔森司。”一个侦探连忙插口道：“不会的，我们正在捉拿柏尔森司，难道你忘记了么？”

法庭中所有的眼睛都注视在布拉克和他的同伴身上。突然检察长格林奈儿惊喜地站了起来叫道：“我看见柏尔森司在这屋子里了。我要求逮捕他。”然而并没有人听他的话。布拉克大佐愤怒、昂然地说道：“这个人现在是在我的保护之下，这样的要求简直是在侮辱我了。”柏尔森司向裁判员说：“阁下，

我来此自首，愿和我的同志一同受审。”裁判官的答覆是：“柏尔森司君，你在罪人席中坐下罢。”

柏尔森司于是坐在他的同志们的旁边。司柏司悲哀地欢迎他的同伴道：“柏尔森司，你跑来送死了。”然而柏尔森司一点也不悔恨。在几分钟后，柏尔森司自首的消息就传遍芝加哥了。

这天晚上，监狱的门关住了他，从此他便不曾活着跑出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九 儿戏的审判

法律本来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工具，然而这次的审判连法律两个字也没有顾到。从裁判官以至于原告证人，没有一个人的举动不是受着金钱的支配。老实说来，就是那四十八万五千元美金在作怪罢了。

塞利格尔是一个社会党人，他是林格的房东。他夫妇俩都被法庭收买了。他虽是被告之一，然而他并不曾到法庭受审，反而做了政府的证人。捏造出种种事实来诬陷林格。

法庭说雪老柏尔特是掷炸弹者，然而他的踪迹既无人知道，法庭也无确实的证据。所以七月十五日检察长格林奈儿在法庭中辩论时，便把那些“罪人”的罪减轻为“造成杀害罪”，就是说被告的言语在演说中或著作中不知不觉引诱某一个不知姓名的人来杀害警察的性命。他绝对不能把这些被审讯的人和假定的罪联起来，也不能证明被告认识那个掷炸弹的人，

或有影响于他的这种举动。在法庭中，许多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及劳动运动的小册子、传单、杂志和新闻纸都被引来当作判罪的根据。格林奈儿居然明白地说：“无政府在审讯中！”他们现在不是在审讯杀害警察的罪犯，他们要审讯无政府主义！此辈的法官狂妄于此可见。法律本是设来保护资产阶级的，更何况法官又受了贿赂。在八月二十的早晨一种惨无人道的判词决定了，除尼伯判十五年徒刑外，其余七人都被判处死刑。

一〇 感情的判决书

支加哥法庭的法官既受了贿，又受着他们自己的偏见的支配，于是抛弃了正义，违背了良心，对于这些宣传真理的人判了这样残酷的刑罚。他们的判决书是对于法律的致命伤，很可使人知道法律的功用究竟是什么。

柏尔森司批评这判决书说：“你们的判决书是感情的判决书，始则由感情的冲动，继则受感情的包围，始终不出乎感情的范围。感情的判决是什么？就是没有理性，缺乏辨别的能力，不能认识真理之所在。你们能否认你们的判决不是偏于保护资本家一方面的吗？我们是宣传真理，替工人鸣不平，为工人争自由谋幸福的人。支加哥的资本家正要铲除我们，叫你们来判我们的死罪。”

—— 第一个演说者

照例，判决了死刑后，法庭方面要问被告有无异议，因此在法庭中每一个先驱者都留下了一些不朽的教训，——这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芝加哥八个无政府党演说。这些演说不仅仅是辩护他们的无罪，而且把草市场会议的始末、实业阶级的情形、无政府主义与劳动运动的性质以及他们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原因都表示出来了。被告八个人共演说了三天，从十月七日到九日。

司柏司是第一个在法庭中演说的人。他的演说是极光荣极能动人的。

“我在这法庭中演说，如像一阶级的代表向另一阶级的代表发言。我现在用五百年前威尼斯人发利里(Falieri)于同样的情形中向法庭演说的话来作我这篇演说的开始。发利里是这样说的：‘我的辩护就是对于你们的控告，我的无辜受刑，就是你们的历史！’我被你们控告为犯谋杀的罪，是一个主谋犯或是一个随从犯。你们根据这个控告便来判我的罪。州政府并不能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曾知道那个抛炸弹的人，或者我与抛炸弹这件事有何种关系。假若没有证据明示我对于此事应负法律上的责任，那么，我的判罪与刑罚的执行不过是故意的、恶毒的、仔细思量出来的谋杀。这种不公正的谋杀在宗教史、政治史以及任何种类关于迫害的记载上常常可以寻得着的。……州政府自己造出大部分的证据，并且选择了一些法

官以这些证据来判定我们的罪。在这法庭上，在这全体旁听者之前，我控告检察长格林奈儿和警察长帮非尔得为凶恶的谋杀犯。”

我们再把他的演说引一节如下：“格林奈儿君说‘无政府在审讯中’，假若这是实情，先生，好得很，你可以判我的罪罢，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相信一阶级掠夺另一阶级的劳力而生活的国家是要消灭的！我相信社会组织的这种野蛮的形式及其法定的抢劫与谋杀是已交死运了！会有一个自由的社会自动的结合或博爱的团结来代替它。可敬的裁判官，你可以处我以任何刑罚，然而却要让全世界知道一八八六年在伊立诺伊州有八个人被判死刑，因为他们相信较好的将来；因为他们未曾失掉对于自由与正义的最后胜利的信仰！”

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些就是我的理想。它们构成了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不能脱离它们，就是能够，我也不愿。假若你以为你能破灭这些分布日广的观念，假若你以为能把我们送到断头台来破灭这些观念，假若你愿意再使平民受死刑，因为他们敢于说真理（我叫你指出我们究竟在何处说过谎话），我说，假若死是对于宣传真理的刑罚，那么我愿昂然地来付那高贵的代价！叫你们的刽子手来罢！虽然苏格拉底、基督、布鲁诺等因宣传而受死刑，然而真理却是永不消灭的。他们与他的同伴已先我们向着这条路前进了。我们预备追随他们。”

一二 无政府是一个梦

尖瓦伯说：“我所要说的话并不多。假若我不发一言不会被人误认为是对法官此时的举动胆小的默许，那么我就会一言不发了。若把在现在审讯中的诉讼叫做‘公道’，要算是一种侮辱。他们法官未曾作过‘公道’也不能够作‘公道’的事。假若一阶级列席陪审来压制其他不能列席陪审的一阶级，这时还要想到‘公道’，非呆即幻。检察长说：‘无政府在审讯中’，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对暴力、反对兽行、反抗犯罪制度的社会学说。我因为在报纸上作文和演说而被处死刑！”

他的演说中有一节最沉痛，我们不可不读的：

“现在的社会制度不是天天在各处杀人么？儿童们未到作工的年龄，竟被逼着去作工，夭折多少生灵；妇女们因操劳过度而牺牲性命者成千成万，男子们死于苦工者日有所闻。我却并未见着法律来阻止这些不人道的事。就拿支加哥一个地方来说，数万工人拥挤于不能容膝的黑屋里，没有新鲜的空气，也没有日光，小孩们同父母吃那些连富人们所养的狗也不食的臭物，疫病到处流行，妇女、小孩死于污秽堆中者不计其数。然而富人们却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丰美的饮食，穿的是华丽的衣服，并且还要虏掠些民间少女来弹唱歌舞以供娱乐。像这种情形所谓文明社会不是率兽食人最可怕的社会么？”

尖瓦伯又说：“无政府是个梦。但仅仅在现在是如此。这

是终久要实现的。理性不管所有的阻碍会生长的。”

他的主张是：“革去这一切不人道的弊端，铲除这一般喝人血吸人脑的富人。使土地和一切财产尽归平民掌握……每日每人只须工作四小时，便可得到充分的需要，享受充分的安慰。其余的时间用来探讨科学，研究艺术。要说无政府主义者是暴徒是很无理由的。这两个名词是绝对不同的。我们固然有时也用暴力，然而这正是用来反抗暴力的。以暴力抵抗暴力，这正是我们不得已的自卫方法。”

一三 突然而死比一寸一寸地 被杀而死更光荣些

尼伯的判罪是很奇怪的，他和草市场群众大会一点关系都没有，便是检事长也找不出反对他的证据。他在法庭上坦白地表示他的态度，他承认他是劳动运动的战士。他的最后的话是：“诸位，我只有一件憾事，假若判决能够改变，假若这是可能的话，我请求你把我也绞死，我以为突然而死比一寸一寸地被杀而死更光荣些。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小孩，假若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死了，他们会来埋葬他的。他们能够到他的坟墓那边去，跪倒在他的坟边，然而他们却不能到监狱里来看他们的父亲——那个无罪而被处刑的父亲。我所要说的已尽于此，诸位，我很以不能和其余的人一同绞杀为憾！”

一四 我正要高声叫你们绞死我罢

尼伯的演说完毕后，又继之以斐失儿的演说。斐失儿的演说是当时演说中最短的一篇，所以我可把它完全引在下面。

“先生，你问我为什么我不应该被处死刑。我并不要说许多话。我只要说，我反对被处死刑，因为我并未犯过罪。我在这屋里因谋杀罪而受审，因信无政府而被定罪。我抗议我被处死刑，因为你们不能证明我曾犯过谋杀罪。然而，假若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爱自由、平等、博爱的缘故而被处死刑，我就并不抗议。假若死是我们爱自由、爱人类的刑罚，那么，我坦然地说，我已经贡献了我的生命了；然而我并不是一个杀人的凶手。我虽然是布置草市场大会诸人之一，但我对于掷炸弹的事是毫无关系的，也许检事长格林奈儿对这事的关系还要比我深些。我承认我曾出席草市场大会，但这大会并不是为着用武力和犯罪的目的而召集的。否，这会议是召集来抗议在麦可米克工场外警察前日所犯的罪恶和暴行的。州法庭的证人瓦勒尔(Waller)及其他的人曾在法庭上证明我们在星期一晚上有过一次会议。在这会议中，我们曾讨论到恰恰在几点钟前发生的麦可米克工场事件，我们决定召集一次群众大会来抗议警察的兽行。现在我只要重述这话就得了。瓦勒尔是这会议的主席，他自己也动议在草市场开大会。而且还是他派我做一委员，印刷传单，邀请演说者；我这样做了，此外并没有别的事。第二天我便到威列尔与克

来因公司(Wehrer and Klien)去印了二万五千张传单，又去邀请司柏司到场讲演。在传单的原稿上，有一句‘工友们，到会时要武装起来’这样的话，我的理由是我不愿见在那次大会里像以前发生的事件一样，工人们无抵抗地被人横加枪击。然而当这传单在印刷时有人送了几张印好的样子到《劳工新闻》社来，司柏司同志看见了一张。我向他说要他到会演讲。他把那传单拿与我看，一面说：‘斐失尔，要是这些传单散布出去了，我便不愿意演说什么。’我承认把那一句话取消，司柏司后来便去演说了。我与这大会的关系不过这点。我是在晚间八点十五分钟到会的。后来柏尔森司中断了斐尔登的演说，他站在台上说，快要下雨了，最好迁到柔夫厅去。这时我才离开草市场到柔夫厅，与我同路去的便是此时还在证人席中的一个朋友。我们拣了两个座位坐下，各人喝了一杯啤酒。我的朋友柏尔森司偕着其他几个人进来了。过后我在那里坐了五分钟，炸弹便爆发了，我完全料想不到会有这一类的事发生，因为，便是州法庭的证人他们自己也承认那晚并没有人主张要防卫我们自己。召集这会议的目的，不过是抗议警察的暴行而已。

“而且像我以前已经说过的，在这里法官的判决并不是对于谋杀罪，而是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我觉得我之被处死刑，或将被处死刑，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缘故，并不是因为我是个杀人的凶手。我并不曾杀过人。我一生从未犯过罪；然而我知道有个人快要犯杀人罪了，这个谋杀的凶犯便是格林奈儿——检事长格林奈儿。因为他带来一些一点事都不

知道的伪证人。他也明知道这些人的宣誓都是虚伪的；而且假若我果然被处死刑，我便宣告格林奈儿是一个杀人的凶手。然而假若这支配阶级以为杀死我们，杀死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便能够毁灭无政府主义，那么，我要告诉他们，这是大大的错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爱他的主义胜于他的生命。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随时随地都预备为主义而死的；然而在这次案件中，你们以杀人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而实际我并不是杀人者。你们要知道，纵然你们能把那些相信主义的人杀死，而主义却是永不能被他们杀掉的。人们为着正当的目的而被处刑的事件愈多，那么，他们理想的实现愈速。例如这十二位“可尊敬的”陪审法官之不公正与野蛮的判决，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进行反有很大的帮助，比较我们这几个被判罪的人在三十年中所能完成的还要大些。这判决是对于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人民不久也会知道的。我所要说的话已尽于此。总之若我因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因爱自由与人道的缘故而受绞刑，我便不觉有什么痛苦，我要高声叫你们，绞死我罢！”

一五 我将快乐地死在绞架上

林格在芝加哥殉道者中算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德国人，生于一八六四年。他于一八八五年秋到芝加哥，即住在赛利格爾(Seliger)家里。他是一个木匠，他便加入一个木工组合。他会制造炸弹。判决他的死刑，是根据着赛利格爾的伪

证。赛利格尔本来也是被告之一，但他因为爱惜生命的缘故，竟受了法庭的贿，做了法庭方面的证人，说芝加哥草市场四日晚上爆发的炸弹是林格做的。本来被告方面有两个证人可以推翻赛利格尔的证据，但法官禁止他们出庭。然而就以赛利格尔的话而论，他也只能证明，林格做过炸弹。

赛利格尔自认他没有钱，曾得了夏克大佐一次一元，一次半元，一次五元的帮助。夏克大佐叫他在法庭说“实话”，又说夏克大佐在他被捕后曾给了他的妻子几次钱，大约二十元或二十五元。他的妻子也出庭做证人。为了三十多元和自己的生命的缘故，便把友人出卖了。

被告方面的辩护士布拉克大佐在法庭上说道：“赛利格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美国很久了。他有三十一岁，林格仅二十一岁，然而大伊立诺伊州由其合法的代表（指法官）居然购买了赛利格尔（一个成年的人）和他的妻子（年纪更大些），所订的条件是假若他们能够尽力把圈套放在这个小孩子（指林格）的颈项上，他们便能无罪地被释放出来。啊！诸君！这是对于正义的怎样一个侮辱啊！”那一般叫做“法官”的，听见了这样的话，扪心自问，能不愧煞！

据后来资产阶级的报纸所载十二个陪审员中有五个是发狂死的，大概是惭愧过甚的缘故罢！

林格与司柏司等同被判处死刑，死刑的执行期是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但十日早晨林格即在狱中“自杀”。情形是这样的：

据说在十一月初，警察在林格的囚室内发现了四个炸弹。

在九日的夜里他坐在囚室内，靠着洋烛的光读书。爆炸的声音听见了，狱卒跑进林格的囚室，看见他的下颚已被炸落了。这究竟是他自杀或是被敌人暗算，他受伤后自己并不曾发一言，实在也不能够说话了。他的短促的一生就是这样的终局。卖友的赛利格尔，叫人卖友的法官从此该可以满足了吧！

然而在四十年后的今日，赛利格尔以及那些法官的骨头早在腐朽了，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引为卑鄙龌龊的符号。而林格的精神却永远存在。支加哥殉道者坟墓前的纪念碑将与他们的演说同样的永垂不朽了。

“法官们：你们曾以讥讽的眼光批评我在这‘自由的美国土地’上要谋一个人值得享受的生活的努力，你们现在又以同样的讥讽的态度，在判决了我的死刑后，允许我有发表最后演讲的自由。

“我接受了你们的允许，来作这最后的演说；但我的目的是要把你们所加于我的不公道、诬蔑、压迫的举动尽量地暴露出来。

“你们控告我犯着谋杀的罪，而且判了我的死刑；然而你们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的罪呢？

“第一，你们叫赛利格尔来证明我的罪。他，我曾帮助过他来制造炸弹，你们又证明我得到了别人的帮助把那些炸弹运到克利布痕路(Avenue Clybonru)五十八号，但是你们纵然得了你们所收买了的‘学舌鹦鹉’赛利格尔(他似乎在这事件里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帮助，也还不能证明，那些炸弹曾被用到草市场。

“你们又叫了两个化学家来考验炸弹，然而结果他们也只能说制造草市场炸弹所用的金属也与我的炸弹所用的相似，你们的阴幹孟（Ingham）先生拚命说那两种炸弹不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话丝毫没有根据。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两种炸弹的直径相差半英寸，虽然他隐匿了那两种炸弹壳相差四分之一英寸的事实。你们便根据了这样的证据来判决我的死罪。

“而且，你们并不是为着谋杀的事来判我的死罪，裁判官在今晨陈述他的‘全案要略’时说得很多。州律师格林奈儿更说过许多次，我们之受审并非为着谋杀罪而是为着无政府，因此那判决是——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什么是无政府？

“这一个题目我的同志们已经解释得很明瞭了，也无须我再来说。他们已很明白的告诉你们，我们的目的是甚么。然而州律师并没有向你们说。他并不批评无政府的学说，他所批评的、判断的只是实现这学说的方法，而且就在这一点，他也完全不曾提到，这是警察的兽行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那些方法的，格林奈儿所提出的救济我们困苦的方法，只是职工组织的团结和投票纸，阴幹孟甚至承认六小时制运动的好处。然而事实却是这样：我们对于使用投票纸和团结工人力量两件事的每一次的努力都遭了你们的摧残，你们暴露了警察们的禽兽一般的暴行。这便是我为甚么要用暴力来和警察的暴力相战斗的缘故了。

“你们说我蔑视法律和秩序，我不懂得你们的‘法律和秩序’等于什么东西。它们的代表是警察，然而其中就有许多盗

贼。夏克大佐在这里，他自己曾向我承认我的帽子和书在他的办公室里被警察们偷去了，这样的东西便是你们财产权利的防卫者！

“那些拘捕我的侦探，他们跑到我屋里来，和强盗一样假冒一个住在柏林敦街的木匠的名字罗伦兹(Lorenz)。他们宣誓说只有我一个人在我的房里，他们简直在欺骗自己。你们没有传克来因夫人(Mrs. Klein)到案作证，她那时在我那里，她可以证明刚才所说的那些侦探怎样假冒别人的名字闯进我的房来，她可以证实他们的证据完全是伪证。

“我们再说下去。夏克大佐是警察们的长官，他自己也就在说谎。他宣誓说我曾承认参加星期一晚的大会，其实我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他，那晚我在柔夫厅参加木工会议。他又宣誓说我曾告诉他，我从莫斯特^①的书里知道了制造炸弹的方法，这也是在说谎。

“我们再进一步来说‘法律与秩序’的代表中的较高级的。州律师格林奈儿及其同事也犯了妄誓之罪。我说他们是有意犯罪的。我的律师已经举出例证了，而且我亲眼看见格林奈儿在基尔美^②出庭的八天以前指示与他，那些要他作证来反对的人们的相貌，叫他认清楚。

“如我刚才所述，我相信要使我自己和工人同胞获得人类应该享受的生活，非靠着武力不可。而同时格林奈儿用他们

① 莫斯特(John Most)：著名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② 基尔美(Gilemer)：法庭方面所收买的证人。

的警察和流氓，收买伪证来谋杀七个人，我便是这七个人中的一个。^①

“格林奈儿实在胆小可怜，他在这不许我防卫自己的法庭中来称我为一个胆小的人。鄙夫！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联络了一群卑鄙的被人雇用的流氓来把我弄到断头台上去。因为世俗上的道理除了可鄙的自私，享世上的荣华富贵以及赚利的欲求而外，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棍徒藉着别的棍徒的伪证的帮助来谋害七个人。这个棍徒叫我为一个‘胆小的人！’，然而你们责备我蔑视那样的‘防卫法律者’——那样言语所形容不出来的妄人！

“无政府的意思是不要人压迫人的强权和统治，然而你们叫这为‘扰乱’。无政府是一种制度，它绝对不赞成需要匪徒和盗贼的服务来防止你们所谓‘扰乱’的那种‘秩序’。

“裁判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州律师并不能证明我与掷炸弹的事有何种关系。然而州律师会用手段，会弄笔墨。他说我是一个‘同谋犯’。然而他怎样能证明呢？他断言国际工人协会是‘谋乱的结党’。我既然是这团体的一个会员，所以他把罪名很安稳的加在我的身上。这真巧妙！以一个州律师的才干说来，世间不会有难事的。

“我不必回顾我和我那些在不幸中的同伴的关系。我的朋友司柏司已解说过我们怎样认识的了。我可以诚实地，坦白地说，我与共同受审的诸同伴的亲密程度尚不及我与夏克

^① 这时尼伯已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失瓦伯、史尔登的判决尚未减轻。

大佐的亲密。

“众人的困苦和资本主义豺狼的肆虐使得我们一起来做运动。不是像分离的个人，而是一群为共同目的的工作者。这便是你们所谓的‘谋乱的结党’，因此你们便判定我的罪。

“我反对这定罪，我反对这法庭的判词。我不认得你们的法律，这是许多世纪以来无数斗筭之徒所混杂的凑起来的东
西，我也不认得法庭的判词。我的律师引了同等级法庭的判词来证明我们应该有更审的权利。州律师便引了更高级法庭的三倍多的判词来证明相反的一方面。我相信在另一次审判里假如受审的仍是无政府主义者，纵然有利于被告的判词引了二十五册，他们也会找出一百册的判词来证明相反的一方面的。而且甚至就在这样的法律，一个小学生都会蔑视的法律之下，他们尚不以合法的手段来判我的罪。他们尚要收买伪证来诬陷我！

“我明白的告诉你们，我是赞成用武力的。我早已向夏克大佐说过：‘假若他们用大炮来对付我们，我们也要用炸弹来对付他们。’

“我再说我是今日之‘秩序’的敌人，我更尽力的重复说着，只要我能呼吸一日，我便仍要来攻击这‘秩序’。我再光明磊落地宣言：我是赞成用武力的。我曾向夏克大佐说过，而且我预备履行的：‘假若你用大炮来打我们，我们也用炸弹来炸你。’你们在笑！也许你们会想：‘你不会再掷炸弹了’；但是我们将使你们确保我会快乐的死在断头台上，我相信那些曾听过我的演说的千万的人会记着我的话；而且当你们把我们绞

死后，你们也记着我的话，他们会来掷炸弹的。我怀着这个希望向你们说：我轻视你们，我轻视你们的秩序，你们的法律，你们用武力支持的权力。绞死我罢！”

一六 我的意见如是，我的希望如是

恩格尔的演说也是极其雄辩的。

他这样的说：“在一八七二年我离开了德国，因为在那里我已不能得着每个人应该享有的生活了。我本来是靠着我双手的劳动来谋我的衣食，然而机器之使用，破坏了我们这一般小手工艺者，使我们的前途异常黑暗。这样我便不得不携着家眷来到美国，因为以前许多人都向我称赞说美国是自由的国土。

“我于一八七三年一月八日到费拉得非亚(Philadelphia)，当我的脚踏上这土地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希望而且相信不久我便要在这自由的国家中与自由的人民一同生活了。我决意做一个美国的良好国民，而且庆祝我自己离开了德国来到这光荣的共和国家。我相信我过去的历史可以证明我曾经努力过要做这国里的一个良好的国民。我来到美国的法庭上，这要算是第一次，而这一次我便被人控告为杀人犯。然而究竟有什么理由会使我站在这里？究竟有什么理由能控告我为一个杀人犯？这是和使我离开德国的理由同样的，工人阶级的贫穷、的悲惨。

“而且在这里，在这‘自由共和国’，在这世界上最富饶的

国家内，仍有无数的贫民，他们得不到饮食，他们被现社会所遗弃，痛苦忧愁的过了一生。我曾看见人从街角的垃圾堆里拾些东西来吃，他们每天的食物便是这个。他们藉此来安静那每天每天蚀耗着他们身体的饥饿。

“我又在每天的报纸上读到许多事实，使我相信在这伟大的‘自由国土’内，人们仍不得不饿死。这使我不得不思想，而且起了这个疑问：使现社会发生这样情形的特别原因，究竟是什么？从此我对于政治制度更加注意。我的研究结果，使我发现德国所有的社会罪恶这里也是一样有的。这便是为什么我要研究社会问题，要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原因。而且从此我便尽力去研究这种新学说。

“在一八七八年我从费拉得非亚来到此地，我极力想改善我的生活情形，我相信在这里谋生活总会较在费拉得非亚容易一些，实在，在那里我已无法维持生活了。然而在这里，我也是异常失望。我才知道无论在纽约，在费拉得非亚，在芝加哥，对于贫民都是一样的。在我作工的工厂里，我认识了一个同伴，他告诉我为什么工人为谋生活要经过如许的困难，而且没有什么效果。他把那原因指示与我了。他以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向我解释说，只要机器原料等仍然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且得着国家的保证，那么，要想靠着我的两手的劳动来维持独立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我从前的想法是大大的错误。因为要更进一层地明瞭这些事实，我便以我自己和家属的劳动所挣来的钱购买了许多社会学的书籍。读了这些书籍后，我便明白为什么在这个富饶的国家内一个工人还不能安稳地生

活下去了。我现在便想用什么方法来救济这个。我最初想到投票箱；因为我常常听见人说工人用这种方法便可以改善他们的境遇。

“我曾以一个好国民那样的热心去参加政治活动。然而不久我便知道‘自由投票箱’的说法完全是一种神话，我晓得我又受欺骗了。我便得着这样的意见：只要工人们在经济上仍为奴隶，他们在政治上绝对不能自由的。我很清楚劳动阶级绝对不能由投票的力量来实现一个保证工作面包以及幸福生活的社会。

“在我对于投票箱的办法还是信仰的时候，下面的一件事情发露出了，这使我相信在这国家内的政治家是极其腐败的。我住在第十四区，我也有投票权，在这一区里社会民主党异常发达，已足危及共和党与民主党，于是共和、民主两党便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这自然是应有的事，因为他们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然而当社会民主党的候补人选出来后，他们的胜利的结果，仍被那两个旧政党的阴谋所破坏了。投票箱被人偷去了，而且票也被人‘改’过了，因此他们无法宣布他们的候补人被选出这回事。工人要在法庭上求得公正的解决，然而结果无效。诉讼的费用共一千五百元，而他们的权利一点也不曾争到。

“不久，我又明白政治的腐败阴谋在社会民主党里也是一样有的。我便退出了社会民主党，加入当时新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这团体的会员都坚定地相信工人要从资本主义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只有用武力之法，恰如历史上所讲的进步一样，

都是靠武力来实现的。就拿美国的历史来说罢，第一次殖民地的人获得他们的自由，也只是靠着武力；奴隶制之废除也只是靠着武力，而且因为那个反对奴隶制的人被迫上了断头台，所以我们也必定要像他那样。在现在替工人说话的人也必要受绞刑。为什么呢？因为管治这个共和国的并不是那些忠于职务的人民。

“所谓保卫国家的利益的人——住在华盛顿城的首领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呢？或是靠着金钱的帮助呢？他们没有权利来替我们制定法律，因为他们并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我并不尊重你们美国的法律！”

“因为机器的改良遂使许多人陷于失业的困境中，有的人减少了一半作工的时间，这样便使他们有思索的机会了。他们有空闲的时间，他们思索怎样才可以改善他们的境遇。那些替他们说话，保卫他们利益的书报到了他们的手里，虽然他们不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要撮取这些书报中所含的真理，在他们是做得到的。这自然是资本家所不高兴的事，但他们也没法来阻止。我始终相信在较短的时期内，那极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会明白，要脱离多年的束缚只有由无政府主义的一条路。我们总该记得加尔·苏尔士(Carl Schurz)差不多距今八年前曾说过：‘在这国内并没有社会主义活动的余地。’然而今天社会主义便出现于这法庭上了。因此更相信要是这几年内足以使社会主义成了一般人极其注意的问题，那么，只要很短的时间便可把它施诸实行了。”

“关于我的判决我所要说的话，我是一点也不惊骇；因为那些努力开导他的同胞求他们的进步的人，常常被投入监狱或被处死刑；自古已如是，约翰·鲍尔^①的事件便是这样。我久已觉察出美国的工人所有的权利，并不比他国工人所有的多一点。检察长说我们不是美国的国民，我早已是美国的国民了，但我并不曾要求过国民的权利，我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分别的。国民也好，不是国民也好——我是一个工人，所以我没有权利，因此我也不尊重你们的权利和你们的法律，这都是一阶级制造出来，而且指挥着来压制其他一阶级——劳动阶级的东西。

“我的罪名究竟是什么呢？”

“我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绝对不会有人利用机械的改良获得百万的财产，而大多数的群众却陷在堕落与困苦的深渊里。既然水和空气是大家可以自由享用的，那么，科学家的发明也应该用在大众的利益上。我们所有的成文法是和自然律相反对的，那些法律把大多数群众的自由、生活，以及求幸福的权利都剥夺去了。我的罪名不过如此！”

“我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人，因此不能不和现社会情形宣战。凡是有思想的人都应该攻击那个使几个人能在数年之间聚集了百万财产，而同时使千万的人成了乞丐和游民的恶制度。

^① 约翰·鲍尔(John Ball)，英国农民暴动的领袖，后被杀。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便起来了，他们努力来创造另一种环境，在这新环境中第一被重视的就是人道，这难道是可惊奇的事么？这便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为我所乐意赞助的。

“检察长说无政府在审讯中。

“无政府主义在我看来是与社会主义一样的。我说：不要再相信投票的办法，只要使用一切可由你处置的其他手段，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被人审判——因为我们曾把正当的路指示与人民。在各处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为此被搜索被迫害了，然而其结果反使无政府主义得到更多的信仰者，而且假若你割断了我们公开活动的机会，我们就要秘密的做去。假若检察长以为他绞杀了七个我们的人，又判了一个人十五年的徒刑，便可以把无政府主义铲除净尽了，那么，他完全错了。战略不久便要改变的，一切都在于此。地上的权力绝对没有能消灭工人们制造炸弹的知识的，他们已有这知识了。我希望检察长格林奈儿和他的帮手富士满 (Furthman) 不要遇着警察长龙甫 (Rumpf) 那样的运命。

“假若无政府主义是可铲除净尽的，那么，在别的国家内应该早已做到了。然而究竟怎样呢？

“在这国内第一次炸弹爆发的那晚，我正在我自己的家里。检察长极力想证实我们的阴谋事件，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诚然这次被审判的同人中有几个是我所认识的，然而大都与我并不十分熟识，有时在会场中遇见他们或听他们演说。我也承认我曾在会场里演说过，我说，要是每个工人都有一个炸弹在他自己的袋里，那么，资本制度的末日就会立刻到了。

“我的意见如是；我的希望如是；当我发觉资本制度现在情形的弱点，这便成了我的信仰了。

“当数百个工人因为矿坑里的设备不良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时，那矿山主还是异常吝啬，不想修整和善后的办法，资本家的报纸也不注意到这样的事。然而当工人们为要求增加几分钱的工资来维持生活的缘故被人枪杀时，那资本家报纸上的记载是何等满意和残酷啊！

“政府是专门给权利于特权阶级，并没有什么权利给工人們的，这样的东西会有人觉得应该尊敬么？最近我们还看见一件事实：几个煤业领袖联合起来阴谋提高煤的售价，而同时减少原已很少的工人的工资。为什么法庭不控诉他们的阴谋呢？然而当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时候，政府便派出军队来枪杀他们了。

“我蔑视这样的政府，我要同它宣战。我蔑视它的权力，我更看不起警察和侦探。

“我所憎恨的，我所要攻击的不是资本家个人，而是那个给他以许多特权的制度。我的最大愿望是工人不久会认识谁是他们的朋友而谁是他们的敌人。

“至于我的判决，我知道这是由资本家的势力而决定的，我一句话也不说。”

一七 我愿自由的牺牲了我的生命

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的法庭演说中，以司柏司、斐尔登。

柏尔森司三人的演说最为雄辩，最能动人。斐尔登在他的演说的开始背诵了一首有名的诗，就是弗勒利格拉斯的《革命颂》。

他先辩驳他和草市场的事件没有一点关系。他指出他们的判罪，仅仅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缘故。他又说到劳动阶级的惨状。关于他们的判罪，他说：“我们曾因法官以为我们有罪而受审判，你们也将因他人以为你们有罪而受审的。”

斐尔登又以和平的宽大的态度说：

“汤姆生·古贝(T. Cooper)在他老年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友人来拜访，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本有图画的书，跑到他面前，翻开书，指着空白页向他说道：‘古贝，给我写点东西在上面罢。’古贝便写着：

爱真理罢，我的孩子，爱真理罢；
拥护真理使它光明，
它会使你的青春之晨欢欣；
虽然这需要着你一生的苦痛和斗争，
但它将永远使你保持着正直和真诚。

“我有一个孩子，今天他在西边街的家里跪在他母亲的旁边，告诉他妈妈说，他想他的爸爸回来。对于他，我决定了，当他能鼓动他的如簧之舌的时候，我要将这美丽的感情教他。假若我因宣传真理而被判罪，面受绞刑，那么，最好不必教这个小孩子读书，最好不要将这爱护真理的感情教他。假若他们因敢于宣传他们所认为的真理而受绞刑，那么，最好把你们的学校一个个铲成平地，不要留一块石子在地上。”

斐尔登结论道：“今天当秋天的美丽的太阳以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时，我却站在这里，我的头是永远不能再沐着阳光了。我爱我的同胞与爱我自己一样，我恨欺骗，我很虚妄，我恨罪恶。十九世纪犯了杀害他的最好的朋友的罪，他将要悔恨的。但是，如我以前所说，假若我的死刑能够有点好处，我愿自由的牺牲了我的生命。我相信那个时代会来的，那时将有较好的理解与智慧存在。在那不平、罪恶与行贿的山上，我希望真理、正义与公道的太阳，以它的光亮洗浴出一个解放的世界来。”

一八 一生最优美的演说

柏尔森司是著名的演说家。他的每篇演说都是极其动人的。在审讯时，七月九日，他在法庭上把五月四日在草市场的讲演辞重述出来。第二天支加哥《太晤士报》批评道：“昨天达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审讯的最高点。失瓦伯、司柏司、柏尔森司等相继在证人席上对着一群如着魔一般的听众，一些惊愕的陪审员，以及惊惶失措的裁判员叙述他们自身的故事。柏尔森司尤其雄辩，泰然自若。当司柏司退席之后，柏尔森司接着走上证人席，他的兄长柏将军在旁听席中两眼注视着他。对于法官严重的发问，柏尔森司全以安静谦和的声调来回答，毫未露出惊惶之色。后来他被要求把在草市场大会中的演讲辞重述出来，他这样做了。自这次审讯开始以来，若说陪审员、法庭听众等曾受着礼遇，那么他们便受着这支加哥无政府主义者

中的主要煽动者的礼遇了。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束记录，便开始对着陪审员演说，他的声调表示出这演说者是在准备一生的最优美的演说。幸而这证人席的椅子是活动椅，能旋转的。他左手握着记录，右手随着身体的转动，做出各种姿势。他以低的合度的声调开始讲演，后来反复申说，从雄辩到技巧，从技巧到逻辑，从逻辑到辩驳。”

这可见柏尔森司的演说之能动人了。而这次最后的一篇演说更是优美，更能动人，并且是最长的。他足足演说了八个小时。十月八日演说两小时，九日演说六小时。他把他一生所从事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劳动运动完全重说了出来。他说，假若他希望那结党营私、公然受贿的裁判员心中还有一点正义与理性的感觉，他便错了。他的演说以一首著名的劳动歌开始。便是黑尔威格的《自由颂》：

世界冷然地叫道：“劳苦啊。祈祷！”

时间是黄金，不要慢慢地去祷告。

在你的房门前，需要的脚步已敏捷地走到；

快快地祈祷罢！因为时间就是面包。

你耕种了田，你斫伐了树，

你修造了屋，你纺织了布，

你收获的只是一些荒草；

说罢，人啊，究竟你曾得着什么了？

你日夜不息地穿梭，

你辛辛苦苦地开矿，

你使大地上的珠宝丰饶。
还有酒啊，谷啊，你造出来的已经足够了。
但谁曾为你预备下了饮食，
谁又曾给了你节令时穿的美衣；
谁又曾给了你防御饥馑的良言，
啊，哪里又是你的快乐的家庭？
你曾创造了周围的一切，
但所有你的工作，哪一样为的是你！
呀！你身上带着重重镣铐，
这一切都是由于你自己的铸造。
镣铐紧紧地锁住了你的身躯，
镣铐紧紧地束缚了你精神的飞翼，
你的小孩们的脚上还带着重重的脚镣，
看啊，工人们，这就是你劳苦的酬报！
你们拼命地劳动勤苦，
养活了一般懒惰的人物；
你们辛苦地织五色的丝，
可怜啊，只织成了你们自己的困苦。
你们造好了房屋，自己却不能居住，
你们更没有蔽风雨的住处；
你们为那些骄傲的人做了精美的鞋，
穿上了鞋，他们便来践踏你。
啊，人类的蜜蜂啊，
难道丰富的自然所给你的，就只有那做蜜蜂的本领？

看罢！懒惰的雄蜂四处飞翔，
你的蜂刺呢，为什么不把它们刺伤？
劳动的人们，起来罢！
你们要知道你们有的是权力，
在你们有力的手腕的命令下，
一切机械的轮转皆会停止。
当你不愿工作的时候，
你的压迫者会将他的双手缩回，
当你说：“已经做够了！”
放下你的锄头，你的事业便开始了。
打倒这相连的二重束缚，
破坏那奴囚你的贫穷的镣铐！
推翻奴隶制的贫穷与残暴；
啊！面包是自由，自由就是面包。

他的重要的话是：“无政府是什么？——我因为它而被判死刑。政府是专制；政府是一个压制的组织，法律（成文法）就是它的代理者。无政府是反对政府，反对治人者，反对独裁者，反对政党。无政府是否认武力，是废除社会事务中的一切强权；他否认人管治人的权利。所有的事物只要是进化的便是社会主义的。在现在世界的劳动运动中有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政府与强权；其他的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政府管治一切。国家社会主义者要以法律的力量来解放工钱劳动者，要以合法的法令来解放他。

们。国家社会主义者要求有选择治理他们的主人的权利。无政府主义者不要任何种类的治人者，也不要任何种类的制造法律者。……无论是一个人压制百万人的政府，或是百万人压制一个人的政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多数压制与反对少数压制是一样的。……多数人来指挥少数人，其结果仅使他们自己变成暴虐者；他们成了剥夺者，他们会否认他人的权利。”

后来他又说：“我们以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会上的财产，凡是文明的产物，都是历代劳工的成绩，都应该属于人类全体，永远归大众享用。”

柏尔森司最后说：“诸位，你们以为使我们上了断头台，社会运动便终止了吗？你们把我绞死以后，社会革命便停止了吗？啊！恐怕不至于如此罢！随着你们对我们的判决而起的，便是美国与全世界的人民对于你们的判决，这个最大的判决，自然要揭出你们的不公，替我们伸冤的。”

一九 悲壮的结婚

当司柏司等在法庭演说的时候，旁听席中有一位凡冉特女士(Nina Van Zandt)，她是一个大富豪的女儿。她受了极大的感动，居然愿意和那已经被判死刑的司柏司结婚。她自述道：“我对于这些被告，一个也不认识。当我进旁听席的时候……我本是带着一种好奇心，来看那些愚顽无知、不识法度、将受绞刑的人。谁知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大为惊异，

那些被告，不但不是愚顽无知的人，而且都是极聪明极勇敢的义士；他们的态度正引起了我的同情……我很愿意和被告处在同样的地位。我对于他们的热烈的同情，引起了我对于司柏司浓厚的爱情，并且这爱情立刻就变成不可制止的情欲了。”

凡冉特女士在监狱里访过司柏司几次，他俩便订了婚。但在监狱是不能行结婚礼的。凡冉特向法庭要求，竟遭拒绝。于是司柏司只得请他的兄弟作代表行结婚礼。一八八七年三月五日的《反抗者》(克鲁泡特金创办的)第四十六号上发表的《纽约通信》说：“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同志能出监狱来与他的勇敢的妻子同享生活的幸福。”然而出监狱的已不是生龙活虎的司柏司，而是他的尸体了。

凡冉特女士当时曾大受社会的攻击，她一点也不害怕。她的答复是：“我宁愿受着这无理性的社会的攻击，决不愿牺牲自己的主张。他们并不懂得真正的爱情是发生于理想的投合与乎痛苦的同情的。而且我最佩服我这些新朋友，因为他们是认识纯洁的爱情的。”

二〇 一个纽约的牧师

在这金钱势力淤满了的美国内，正义、人道的名词早已成了梦幻了。这时候居然有一个纽约的牧师，他听见了判决的消息，愤怒到了极点。他牺牲了自己的几千元的俸金来替被告辩护。他的伸冤状内有一节如下：

法庭和政府都是保护富人以及无人格者的东西。工人为谋改善他们的情形起见，开会讨论办法，本无恶意。但警察竟以暴力来解散他们。投炸弹的人也是以自卫为目的。既然一方面以暴力压制，他方面也就可以暴力抵抗。以人权而论，并非违法的行为。

这个牧师叫做彭特可斯特。他的举动既可证明司柏司等无罪，又可证明正义、人道终究不能消灭的。然而全美国的牧师中只有彭特可斯特一人来为着殉道者辩护，可见那些“假冒为善”的牧师教徒原是与资本家狼狈为奸的。

二一 “我愿意死”

在听了被告的勇敢的骄傲的演说后，裁判官加利竟恼羞成怒，于是陪审员的判词又经他承认了。在十月九日他便向被告宣读判词。被告的律师要求再审，又被裁判官驳回。再上控到本州最高法庭去，到了一八八七年九月十四日，又遭最高法庭的驳斥。最后上控到合众国的最高法庭，又被该法庭以无权受理的托词拒绝了。法律上的手续都用尽了，只有请求州长减刑的一条路可走了。

当被告律师正预备上控到合众国最高法庭时，林格与恩格尔在监狱中写了下面的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九月十五日。

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我知道你们，特别是律师预备向合众国的最高法庭

上诉，我不得不向你们说我反对这种举动，我反对向治人阶级去要求“正义”！

朋友们和同志们！我很愤恨这种办法，难道我们要使人们疑惑工人们竟是如此愚蠢，还需得那最高法院（这是合法的暴政，掠夺和资本的最高的化身）再来证实一次这可耻的判决，才能明白那些匪徒们之所谓正义么？……

假若有人说我相信在我们的死刑执行时美国的人民会真正觉悟的，那么我要说我完全不是这样想。而且我还反对那种思想——就是芝加哥的同志们以为他们有尽力援救我们的义务。因为要能够救出我们，非有大的暴动不行，这不是几个人的意志所能做成的。所以要责备我们的同志不努力，这太不公道了。我们应该责备全体的工人群众。

反而我愿意死，我坚决的相信我们的牺牲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的社会早日灭亡，较之我们再在监狱里住三四年，等候合众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当好过千万倍。我以为治人阶级的这种“正义”对于全世界的自由的害处，比较他们的狂暴的复仇还要厉害些。

这便是我的决定的理由。

无政府万岁！以兄弟般的感情祝福你们。

鲁意·林格

林格的意见也就是我的意见。

恩格尔

林格是错了，他以为治人阶级还有一点冒牌的“正义”，其实那般畜生连冒牌的正义也没有的。到了十一月二日合众国的最高法庭的决定便公布了。

二二 绞杀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

法律的手续既用完了，那么只有要求州长减刑的一条路可走了。于是在州长阿格列斯拜 (R. Oglesby) 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从各处来的请求减刑书。各国无产阶级也开会抗议。世界上的著名思想家也表示他们对于“法律下的谋杀”的憎恨。著名社会主义的文学家摩理思 (W. Morris) 在寄诗人勃朗林 (R. Browning) 的信里说：“我请求你在这请求减刑书上签名，尽你所能做到的去救七个人的生命，他们在经过了一次滑稽的审判后便被判处死刑。……我不知你究竟曾否留意这件事，英国报纸也少有记载。然而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说在支加哥劳动者与资本家斗争激烈的时期中，他们为着他们的主义竟代支加哥全体工人牺牲了。……”

克鲁泡特金写了一封《告美国人书》在纽约《明星报》发表。他说：“假若我们的同志被绞杀了，我们也要求工人来绞杀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因为这是他们激起那一群匪徒来杀害我们的同志的。”

二三 司柏司愿代同志死

一切都完了，只有盼望着州长来减刑了。照例律师请求减刑时被告应该在状上签名。然而这七个人都不肯签名。他们的同志不忍见他们去死，便写了无数的信要求他们在减刑状上签名，他们的家属也苦求着。著名纽约的无政府主义者尤斯达斯·失瓦伯的一封信感动了斐尔登、失瓦伯、司柏司。他说，“要是你们存在，自由也就存在了。……”斐尔登、失瓦伯、司柏司三人便在减刑状上签了名。同时司柏司等三人联名寄了一封信与州长，柏尔森司等四人也各上书州长，他们要求正义，不要求特赦。司柏司又写了一封信与州长，要求州长保全他的同伴的生命，只把他一个人杀了来平息资产阶级的愤怒。他在这封信里首先解说何以他和斐尔登、失瓦伯三人签了名，而柏尔森司等又不签名的原因。最后他说：“我依这国土的习惯请求你阻止这种七重的谋杀，这些人的唯一的罪名不过因为他们理想家，他们渴望着全人类的较好的将来。假若这法律的谋杀是免不掉的话，那么我请求你杀了我一个人好了。”然而伊立诺伊州不仅杀了他，而且把他的四个同志也杀了。

二四 给我以自由，否则便给我以死

柏尔森司本来可以不死。检事长格林奈儿在控诉完毕时，

曾说被告的罪名是有等级的，其次序如下：司柏司、林格、斐失儿、恩格尔、斐尔登、柏尔森司、失瓦伯、尼伯。格林奈儿后来又向人说斐尔登与失瓦伯可望减刑。柏尔森司因为是自首的缘故，本不应处死刑，格林奈儿也有意开脱他的。但他的八小时的演说，寒了那畜生的胆，一线的希望也被铲除尽了。

州长也有意减轻柏尔森司的死刑，然而柏尔森司以为“不自由勿宁死”。他寄给州长的信里以轻蔑的态度拒绝特赦，他要完全的自由。在《告美国人书》的结尾，他引用亨利(Patrik Henry)的话：“难道生命竟是如此的宝贵，和平竟是如此的甜蜜，须得用奴隶的铁练来作代价么？万能的神呵，阻止它罢。我不知道别人将走什么样的路，至于我呢，给我以自由，否则给我以死。”

布拉克大佐记述当时的经过情形道：“……我明白地告诉柏尔森司，只要他肯在减刑状上签名，舆论一定会使州长减轻他的刑罚的，……他回答我道：‘我知道我若签名，我的刑罚会被减轻的。前星期日《每日新闻》的主笔来我囚室谈了两点钟。他极力劝我签名，并且说我若这样做了，他们的报纸一定替我鼓吹。我明白这个。然而我不这样做。我志已决，我请求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是无罪的，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我的无罪。假若我果然被杀了，这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谋杀犯；因为我过去的演说和论文，而不是因为我曾掷了草市场的炸弹。假若伊立诺伊州的人民能够绞杀这个自投罗网的无罪的人，我也能够为我的主义而甘愿被绞杀。’我听了这样的话竟不知要怎样答复才好。我觉得我的脸

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柏尔森司的脸突然温和了，他又说道：“我告诉你我的真正的秘密，相信我罢。我有一线希望（固然是很薄弱的），我希望我的态度能够救出林格、恩格尔和斐失儿来。司柏司、斐尔登、失瓦伯已签了名，可望不死。然而政府是决意要杀人的。要是我签名了，我便可不死，但林格、斐失儿、恩格尔三人就没有活命的希望了。所以我决定与他们处在同样的命运中。我知道这希望有限得很，在一千分中只有一分的希望；然而要想救他们，只有这样的办法了。其结果，他们怎样我也就怎样。我是绝对不愿和他们离开的。我恐怕结果定是会同他们一起被绞杀，我已预备好了。”我不能辩驳他的话，而且我也不想。我明白柏尔森司所说的话是真的。我知道只有这种办法也许可以救活其他的三个人。我也知道结果大概会是他们一起被杀。然而对于这一个人他安静地去就死而且决意牺牲自己以求忠实于同志，对于他，我没有话回答了。我握着他的手，注视着他的脸，而且向他说：“你的行动是值得的，”就离开监狱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见州长时，他问我柏尔森司签名没有，我知道他的命意。在星期三（十一月九日）我最后一次和柏尔森司会而时，我还向他说，就是在现在他肯签名，他也不致于死，他安然地答复道：“我不能够这样做，我预备忍受一切的命运！”我只得再握了他的手，便走了。我知道有些人读了我的叙述会明白何以我爱这个人以及他的同志们。他是一个英雄的材料。我不迟疑地说柏尔森司是一个英雄。”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郎无^①叙述当时的情形道：“在死刑执行期逼近了的时候，柏尔森司的事便有了希望。他的自首和他的无畏的态度已激起了人们的同情。律师们和许多有名望的人物都要求他在减刑状上签名。……我向他说明林格等五人中，只有他（柏尔森司）可望减刑。他恳切地激动地回答说：‘然而斐失儿和恩格尔说假若我肯签名，他们也愿意签名；他们愿听我来决定。你看他们会得死么？’我说林格、斐失儿、恩格尔、司柏司等四人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了。于是他站了起来以坚决的态度说：‘难道从此以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早晨起床的时候，我愿意被那种思想来缠着，说我出卖了同志，叫他们徒然地做出胆小的举动么？不，我愿意和他们同死！’在他遇害前的两晚，他的同志们甚至于他的妻子都被拒绝入狱去看他，然而有人去告诉他说，《每日新闻》的主笔司顿君要在图书馆内见他。柏尔森司说非司顿君亲到囚室里来，他是不愿见的。司顿便跑到囚室来，他是公民联合会的主要份子，他和柏尔森司谈了三小时之久，他以和善的态度又以柏尔森司的妻子儿女的名义要求柏尔森司在减刑状上签名，以便保全他的生命。柏尔森司早拒绝了。最后柏尔森司被说得厌烦了，跳起来用手指着他说道：‘司顿君，你对于我的命运也应该负责。我被囚在这里等候星期五的死刑，大部分也是由于你的力量。我来自首，因为我知道我是无罪的人；然而你们报纸上的恶毒的攻击帮助判定了我们的死刑。我死，我以一颗坦白的无畏

^① 郎无(Dyer Lum)，后来也是一个殉道者。

的心同死，而你活着，你会觉得悔恨和恐惧的，因为我的血喷在你的头上了。我的话已尽于此！去罢！’司顿便走了。……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一群无耻的匪徒要想把他绞死的。”

二五 为未出世的孩子而死

就在这晚上司顿走了以后，柏尔森司在监狱中写了给他的八岁的男孩、七岁的女孩的一封最后的信：

我的亲爱的孩子们：

当我写这个字的时候，我已流了无数的眼泪在你们的名字上了。我们永不能再见了。啊！我的亲爱的孩子啊，你们的爸爸是怎样的疼爱你们。我们拿为爱人而生的事实来表示我们的爱情，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又拿为爱人而死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爱情。至于我的一生以及我的非自然的残酷的死。你们可以从他人处听来。你们的父亲是自由与幸福的祭坛上之自愿的牺牲。我留给你们的遗产是一个诚实的姓名和尽了的责任。你们保存它，发挥它罢！对于你们自己要忠实，那么对于别人也不会虚伪的。你们要勤勉，要刻苦，要快乐。你们的母亲啊，她是一个最伟大最高贵的女人。爱她，敬她，服从她罢。我的孩子们，我的宝贝，我求你们在每年我的忌日中读一遍这封告别的信。你们要想着他，他不仅是为你们而死，他也是为那些未出世的孩子而死的。祝福你们，我的爱

儿。永别了。

你们的父亲阿尔伯特·柏尔森司

在这信的封面上他叫他们要等到第二年的十一月十一日（他的周年纪念日）才可以拆开来读。

二六 我的宗教

在写这封告别信的前六日，柏尔森司曾寄了一封信给《芝加哥民报》：

《民报》记者：在本日《民报》的《人民之声》一栏里，一个读者来信问道：“敢问无政府主义者柏尔森司的宗教是什么，或者他究竟有无宗教，请答复，以决众人之争论。”你的答复是：“没有”。

关于我的宗教的问题，在我被法律谋杀了以后，一定会引起争论的，那时我却不能够来说话了，所以在现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愿意来答复你们的问题，来决定你们的争论。宗教一个名词，照现在一般人的使用上看来，只不过表示一种迷信的盲目的信仰，和奸滑的流氓的假面具罢了。

假若果然有一个控制宇宙地球以及人类的万能的上帝，那么为什么那些信奉“他”的教义的人们居然来拥护人造的政府和人为的法律，而且不惜违背“他”的教义，侮

辱“他”的仁慈，用滴血的武器来防卫这人造的政府和人为的法律呢？

我的宗教——假若这可以说是宗教的话——就是：正当的生，正当的死。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道。而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儿戏、欺骗和圈套。

柏尔森司

二七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当殉道者在监狱中等待死刑的时候，全世界的工人也在外面表示他们的愤怒了。纽约职工联合的宣言在无数的抗议书中要算是最沉痛的了。

这篇宣言里有一节是：“为什么法庭要判定这些忠实的人的死刑呢？——因为他们敢于使用美国宪法所定的自由的权利。除了这个罪名而外，他们是一点罪名也没有的。连裁判员等的诬告以及被购买来的证人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出其他的罪来。而且你，美国的人民啊，法庭是假借了你们的名义要来杀这些人的。你们能够听随人假借你们的名义来犯这样可耻的谋杀么？不，千万个不，你们快起来使你们的抗议成为有力的呼声。你们不要相信人道之敌的话，把‘无政府’当成怪物那样。‘无政府’并不是人与人间的野蛮的斗争，它是人类之博爱的和谐。这是废止游惰阶级对于工人的掠夺，这是废止专制的暴政；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无政府——这

是人道，这是自由，这是正义。”

宣言的结尾是：“他们要实行恐怖主义了。他们要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好罢，他们的恐怖只有用赤血来压制的。布鲁塔斯^①难道还在酣睡么？对于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不再是无意义的语句了。”

二八 我何幸而得为主义牺牲

斐失儿在死刑前六日也写了一封诀别的信与约翰·莫斯特：

亲爱的朋友约翰：

因为我们只有六天可活了，我愿意和你告别。你从新闻纸上当知道我们中有四个人是不肯在减刑状上签名的。就是说我们要自由，不然就要死。政府既不能给我们以自由，那么我们只有死了。

约翰，你知道我一想起我的妻子和三个小孩，我的心便强健起来了，我连一点妄念也没有。社会革命需要着促进的力量，而我们的高贵的主义“无政府”也需要着殉道者。我何幸而得为我们高贵的主义牺牲生命！

那些可怜的农民应君主之命作了专制的祭坛上的牺牲，难道我们争真正自由的战士便不应该为了我们的伟

^① 布鲁塔斯(Brutus)：刺杀罗马大将该撒者。

大的高贵的主义而牺牲生命么？

那些不忠实于主义的胆小的人连为主义烧灼一根手指的勇气也没有。难道我们要学他们么？我们应该指示与我们的敌人看，无政府主义者是能够为主义而死的。我对于我的主义是忠实的，我以我的死来证明。——因此，我就向你告别了。

望你仍然像从前那样忠实于我们的主义，而且不管怎样困难，仍望你永远高竖着我们的旗帜。

我希望能活着直到那大战斗的日子。啊，我也很愿意我自己也在这次战斗中身死在我们旗帜之下。然而这不能够。我已坚强地决定像一个先驱者的样子而死，像这次大战的先锋的样子而死。那么，——永别了。

社会革命万岁！无政府万岁！

阿道尔夫·斐失儿

问候各同志及各朋友，请你帮助我的家庭，使我的妻儿不致饿死，我的孩子能受教育便够了。

斐失儿再及

二九 林格有母

林格在死囚牢中拒绝在减刑状上签名的时候，他的母亲写信给他说：

你知道，我也是这样的。我为着你、你的妹妹以及我

自己的面包已苦斗了一生了。你在生我以有你这个儿子而骄傲，你死后我也是以有你这个儿子而骄傲的。虽然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愿意像你那样做；假若我是一个男子啊！

林格的婶母没有儿子，她平日很爱林格。这时她也写信给他道：

亲爱的鲁意：不管你遇着怎样的命运，——即便是最坏的——千万不要在这苦痛的情境中露出一一点懦弱的样子来！

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有这样的一个母亲的！林格真正可说是有了母了。

三〇 这是一个人，一个英雄

“这是一个人，一个英雄。”四十年前出版的《反抗》周刊上用了这样的标题来描写林格的死，这是不错的。

林格是在监狱中自杀的，时间是十一月十日的早晨，是在州长的决定还未公布，斐尔登的死刑还未减轻的时候。林格的自杀是必然的，因为像他那样性格的人绝对不能被人像猪狗一般的绞杀。柏尔森司等是伟大的，然而林格是勇敢的。他是绝对不能被绞杀的。

他在囚室内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制造起炸弹来。他的囚室里有两个炸弹：一个是圆的，还有一个。这是在煤气管里面

装满了炸药和铁屑，管头是盖着的，只要激烈的撞击一下，至少监狱的大部分是要被扫去的，几个殉道者自然会同归于尽了。

然而六日的晚上恩格尔服毒自杀，未成。据他自己说，他的妻子很早便把鸦片烟拿进来了。不幸这事被狱卒发觉，立刻带进医生来把呕吐的药灌进他的口里，又强迫他在天井中走了两小时。居然把他救回来了。然而在六日之后人们又把他送上绞首台去。

恩格尔的失败影响了林格的工作。他的囚室第二天便被搜查，炸弹的秘密也被发现了。然而林格是不肯屈服的。同天他又写信痛骂他的敌人，说他不肯被他们绞死。狱卒又来检查他的囚室，一无所得。

十日的早晨狱卒站在林格的囚室门口，看见林格燃火柴吸烟。突然炸弹爆炸，林格倒在地上，他的下颚完全被炸脱了。血不住的流，经过五个小时的苦痛后，他便死去了。

资产阶级究竟不曾绞杀了林格。虽然这样的死比那十几分钟的绞刑更苦痛些，然而林格究竟完成了他的性格的一致，就在死的时候他也寒了资产阶级的胆了。

三一 爱正义恨罪恶的斐尔登与失瓦伯

就在林格自杀的那一天，伊立诺伊州州长的决定公布了。斐尔登、失瓦伯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斐尔登、失瓦伯的减刑是在一般人意料中的事。因为资产阶级要顾全一点面子，要

表示一点他们的仁慈心，而且要敷衍那从四面八方来的无数的抗议，他们便不得不保全一两个被告的生命。斐尔登、失瓦伯两个人的罪名最轻，自然可望保全。

十一月八日裁判官加利在致州长的一封长信中曾批评斐尔登道：“这个人的天性中含得有一种宝爱正义和憎恨罪恶的性质。在他的私人生活中，他又是诚实的、勤勉的、和平的人。他在法庭中的演说又是很和平而且合度的。他以后的言语及行动又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他和草市场的炸弹事件有一点关系。总之，与其说他是一个以演说或文章来引人犯暴行的罪人，不如说他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热心家。”

格林奈儿在这封信的后面又增加道：“因为要表示我赞成裁判官加利的陈述，我愿意在此加上我的意见，我说失瓦伯也和斐尔登一样，他在审讯中的行动，他在法庭的演说都是很合度而且可赞美的，对于法律亦无不合。我相信失瓦伯是一个温顺的人，是一个有较强的意志和那些更奸滑的人的柔弱的工具。”

这样在十一月十日斐尔登与失瓦伯的死刑便被州长减轻为无期徒刑了。斐尔登与失瓦伯听见了这个消息，脸上顿现出苦痛之色，他们说，他们愿意突然而死不愿慢性的被杀。

假若裁判官和检事长的话是真的，斐尔登是爱正义、恨罪恶的人，又是诚实的、勤勉的、和平的人；失瓦伯是一个温和的人。他们的演说既是合度的，那么他们一点罪也没有。然而就是这同样的法官借着同样的法律的名义把这两个无罪的好

人判了死刑，又由州长出来把他们的死刑减为终身监禁。

从此还有人肯相信那恨正义、爱罪恶的法律么？

三二 临刑的前夕

州长的决定是在十日午后公布的，这时一切的希望都断绝了。殉道者的家属及同志们的悲哀自不必说。而殉道者自己却是泰然自若的。斐失儿和恩格尔一点表示也没有，柏尔森司微笑着，司柏司痛骂那些吃人的畜生。

恩格尔在这天晚上，尽力向狱卒宣传无政府主义，有人问他：“你真完全不怕死么？”他的回答是：“你看我罢！”斐失儿很悔恨不能像林格那样的死，而让资产阶级来杀他。司柏司见着牧师。牧师说：“我来为你祷告。”司柏司昂然答道：“你应该为你自己祷告，你比较我更需要忏悔。”司柏司拒绝了牧师，便来写信。在这天晚上他向守着他的两个狱卒演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革命的真谛，以及法庭的欺骗。

柏尔森司在这晚上是很快乐的，他和管狱谈了三个小时。最初谈社会主义，谈无政府，又谈草市场事件，后来谈到他的妻子和儿女，谈到最后，他竟悲哀起来了。他说他的妻子是一个勇敢的妇人，一个忠实的妻子，一个良善的母亲。他又唱了许多首的歌。当他唱的时候，他的同志们在邻近的囚室里躺在床上用肘支着头静静地听着。直到三点钟柏尔森司才入睡。在天井中人们正在筑绞刑台，声音很响亮，殉道者听见了，并不曾现出苦痛的样子。狱吏劝柏尔森司早点安睡，柏

尔森司滑稽地答道：“听见这筑绞刑台的音乐，人怎么能睡觉呢？”

三三 最后的一日

在临刑的那一天，殉道者起得很早。每人都接到很多的电报，他们也发了些回信出去。恩格尔和牧师讨论神学，就在最后的几点钟内，他还攻击那般假冒为善的教徒。牧师又去找司柏司，然而司柏司一面吸烟一面写信，并不睬他。斐失儿和狱卒谈到他的家乡和他的儿时的情形。斐失儿又唱《马赛歌》，他的同志们也唱革命歌和之。柏尔森司和狱吏布南奈德说：“我一生常为同胞谋幸福。我和一颗清白的心同死。我是为他人的幸福而死的。”他又向人说他的妻子是一个有“狮心”的女人。有人劝他喝一点刺激性的东西，他拒绝道：“我愿清醒的死！”

司柏司在赴绞刑台以前接到一封信，他读后沉思了半晌。柏尔森司接到四个电报。第一个是他的哥哥发的：

亲爱的阿尔柏特：今晚有一群天使以怜悯的眼光注视着人对于人残酷的惨剧。现在全欧美有数百万的心在为着这几个“为人道而死的人”悲痛了。我以你的高贵，你的刚毅，你的遗传的英雄气概而自豪。

你的哥哥 十一月十日自纽约发

接到了第一个电报，柏尔森司把一方红色的丝帕送与他的哥哥。

第二个——

柏尔森司：不要告别，但为弟兄们欢呼。从绞刑台上，队伍的出发快要开始了。我预备来听铛铛的鼓响。

J. T. 十一日自波士顿发

第三个——

柏尔森司：光荣的殉道者，为着社会的进步的缘故勇敢的就义！

C. R. D. 十一日自圣路易发

第四个——

勇敢的柏尔森司：你的名字将长存于世界，不久人们便要问：“阿格列斯拜是什么人”了。

四公民 十一月十一日自旧金山发

柏尔森司读了第四个电报后，就在这个电报的背面用铅笔写着：“柏尔森司，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交与狱吏布南奈德说：“我送给你一件纪念品。”

一个狱吏劝柏尔森司喝一杯酒。柏尔森司拒绝道：“谢谢你。我愿意喝一杯咖啡。”一杯咖啡和一碟饼干送来了。他喝了咖啡吃了几块饼干，便向狱吏说：“我觉得什么都对了。让我们来弄完那件事罢。”

十一点五十分执行官到狱中来了。四个殉道者穿上了白

色的尸衣，便被引到绞首台上去，从当时所留下的许多照片上我们可知道从囚室到绞首台时，司柏司在前，其次是斐失儿，再其次是恩格尔，最后是柏尔森司。

由囚室中出发时，斐失儿向斐尔登和失瓦伯叫道：“失瓦伯兄弟，我们去了，愿你能早日出狱，得享幸福的生活。”“别了，散姆^①。”司柏司和恩格尔也高叫：“散姆，永别了。”失瓦伯站在他的囚室门前，脸紧靠着铁格子。眼泪流过他的双颊，流到他浓密的长髯里去了。

斐尔登站在囚室里望着，叹息道：“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他眼见着他的同志们走向绞刑台上去，他半昏迷地转过身子，跪在他的床边，头放在床褥上，一阵痉挛的悲咽使得他的身子战栗起来。狱卒走了过来，他才慢慢地止着悲哀。忽然一阵悲感侵袭了他，这一个强壮的大人竟痛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似的。

三四 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

站在绞首台上，四个殉道者直立着，一点也不动，让执行官布置。一切都布置好，只等候执行官发命令了。于是司柏司开口说道：“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今天被你们缢杀的声音更有力量的时候快要到了！”

斐失儿叫道：“无政府万岁！”

^① 散姆：散姆尔·斐尔登的昵称，表示亲密的意思。

恩格尔叫道：“无政府万岁！”

斐失儿：“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

柏尔森司极其安静。当他的脚踏上绞首台的时候，他的形容完全变了。他的精神不再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了。在这四个殉道者中只有柏尔森司是个美国人。他好像要使他临死的态度给与所有将来的人以一个重大的影响，使后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殉道者。一份资产阶级的报纸批评他说：“全美国的著名悲剧家在戏台上所表演的牺牲自己的英雄，也不及柏尔森司那样有声有色。”他的双眼向上望，注视着远处。他的态度异常泰然自若。那奇丑的尸衣上的每条折痕反而使人觉得他的态度更为明显。——这便是那幅绞首台全景的图画中最能动人的景象了。他直立着以责备的和诚恳的眼光望着台下的人们。他说：“美国人，许我说话么？执行官马曾，让我来说话！让民众的呼声响起来罢！——”这时执行官发了行刑的号令，于是，在十几分钟后，支加哥的殉道者便荷着充满天地的荣光而长逝了。以这种至仁至勇的态度而就死刑的，古今来究竟曾有几人！

三五 最后的两封信

亲爱的同志郎无：午前八点钟。狱卒来叫醒了我。我洗了脸喝了咖啡。医生问我要服兴奋剂否，我拒绝了。亲爱的同志恩格尔、斐失儿、司柏司以坚决的声音招呼我。

请你去见执行官马曾，索取我的信件及书报等。并

请你把我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其哲学及其科学之基础》整理出版。

八点钟以后：——亲爱的同志啊，定命的时候快来了。魔王昨晚在建造他的宝座——我的绞首台。那锯子铁锤的声音(音乐)使我很久不能入睡。这便是文明！马曾告诉我说魔王要藏起我的尸体，然而他不答应，他刚才请我把我妻子的地址告诉他，以便把我的遗骸送去。好，大量的魔王！别了！社会革命万岁！问候所有的同志。

柏尔森司

伊立诺伊州苦克县执行官马曾君：我请求你将我的遗骸交与我的妻子鲁西柏尔森司，寓密尔何基路七百八十五号。

柏尔森司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午前九点十分

观此可知道那般魔王的用心了。芝加哥公民联合会叫马曾将殉道者的遗骸藏起，马曾不听。他因此叫殉道者各人写了一封请托书，表示他们愿将遗骸交与家属。然后他把请托书交与担任葬事的人，叫这些人在监狱外面等着，防备盗尸的事。这两封遗书已足表示出资产阶级的凶狠了。

不仅是！柏尔森司夫人这天早晨带了她的两个小孩同着何尔门斯夫人到监狱去和她丈夫作最后的诀别，并叫小孩来见他们父亲的最后一面。她不但不能进去，而且被警察拘捕了。她的孩子和何尔门斯夫人被关入警察署且被搜查，直到三点钟才被释放出来。这时已是死刑执行过后的三小时了。

三六 柏尔森司的遗著

《无政府主义：其哲学及其科学之基础》是柏尔森司在临死前三十天开始写的一部书。在这里面他不仅叙述他的思想，并且把他最后的生活以及他对快来的死刑的感想都详细写出来了。这部书的题词是：

当人民在专制之前静默着的时候，他们的冷淡便是他们死期的预兆。

在这书中他说：“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可用一个字来包括，这个字就是自由。”

三七 最后的休息地方

十一月十四日举行殉道者的葬礼，送葬的人不计其数。除了五个殉道者的灵柩外，有几千部的马车，里面坐的尽是死者的家属、亲友和同志们。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几部马车，便是死者家属的车子。第一部车里坐着两个穿黑衣的女人：一个是白发的老妇，她在这几天之中竟长大了十多岁。这就是司柏司的母亲。靠着她而且握着她的手的是一个美丽的青年女郎，眼里还留着晶莹的泪珠。这便是司柏司在判了死刑后结婚的妻子凡冉特。恩格尔夫人和她的十九岁的女儿同林格的未婚妻蜜勒尔女士(Edna Muller)坐一部车。斐失儿夫人和失瓦

伯夫人坐一部车。柏尔森司夫人带了她的两个小孩坐一部车。……放灵柩的车子经过的每条街，满街都是行人。行人的帽子一概脱下来了，他们并且表示诚恳的敬意。“他们不知道这个，但他们多少觉得，他们是在伟大的死者之前，那些人是死得极其高尚的。”

到了墓地，因为送葬的人太多，已把草地踏出了一条平路。在坟前有六个人用英文及德文演说，最动人的要算是布拉克的一篇演说。“从此在各处所赠的花圈堆积的花山下面，在无数悲哀的亲属和同志的面前，我们的亲爱的同志便安静地睡在他们最后休息的地方——德司勃林河畔了。”

送葬的十五万工人在殉道者的坟墓前立了一块巍峨的纪念碑，石座上刻着：“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被你们谋杀的声音更有力量的时候快到了。”

三八 劫狱计划的失败

法律下的大谋杀完成了，五个最好的人在绞刑台上死了。资产阶级的快乐是言语所不能形容出来的，劳动阶级的愤怒和悲哀也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呢？他们并不是在旁边坐视着同志们的被害，他们也曾想法援救那些殉道者。

在殉道者的刑期逼近了的时候，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带着武器到支加哥来的共有数百人，他们预备劫狱，然而监狱外有数千名军警在守卫，他们冲不进去。同时支加哥较著名

的无政府主义者每人都受着三四个警察的监视。在十月内报纸上便登载出无政府主义者武装劫狱的计划了。报纸上并登载了其中最活动的三十八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他们的身后都有侦探追随着，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警察署都会接着报告的。

最后警察当局竟采用英国政府在利物浦对待爱尔兰革命党的办法，派三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监视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执行死刑的前几天支加哥完全在特别戒严的状态中。这样劫狱的计划自然会失败了。

三九 阴谋的发现

六年的长时间在痛苦中过去了。一八九三年正月阿尔结尔德(J. P. Altgeld)被选举为伊立诺伊州州长，殉道者的友人们请求他重查这个案件。阿尔结尔德精细地把全案卷宗检阅一遍，发现了真相。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发出理由书宣告法官受贿枉法，并替殉道者洗去一切的罪名，说警察攻击草市场群众大会的举动是一种罪恶。斐尔登、失瓦伯、尼伯也立刻被释出来了。

阿尔结尔德的理由书很长，最后一节是：

全案的事实只能表示草市场炸弹的爆炸是个人复仇的举动。原告方面并不能证明掷炸弹的人是谁，而且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掷炸弹者曾听过被告的演说或读过

被告的论文；因此便不能证明掷炸弹者是受着被告的劝告才来掷炸弹的。既然他不曾受着被告的劝告，那么被告便是完全无罪；即裁判官加利引证的法款也不证明他们是有罪的。

在最后叙述裁判官凶狠残酷的事实中，有一节是：

最近裁判官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虽然事情已过了六年，这篇文章里仍含有毒意。他把在六年前审判完后一个激动的妇人写与一家报纸的信转录出来，并且极力攻击这妇人，想引起人们的偏见来反对死者与生者。不仅如此，在此文中他还极力攻击某被告律师^①，因为在五个被告的尸体下葬时，那个律师曾在被告的坟前演说赞扬他们，他相信他们是无罪的。这种凶狠残酷是为有史以来所未见的。他绞杀了被告尚不够，在他们死后他还要来侮辱他们。

从此在警察、法官、资本家和政府所犯的罪恶上又添上了这一次最凶狠最卑鄙的罪恶了。这不过是“法律与秩序”的最无耻的阴谋已发觉了的一件而已，然而就只这一件，已经可以把芝加哥（全美国）警察的蛮横、法官的腐败和残酷的裁判官加利的罪恶显露于世界了。

^① 被告律师：指布拉克。

四〇 致后死者

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生存着的也没有理由再来哀悼这些死者。我们已经哭得够多了，然而谁曾见过我们的一滴泪来，谁又曾听过我们的一声哭来！假若我们的呼声不能成为一种力量，难道我们哭到天摇地撼，就会把已死的人哭得回来么？可怜的后死者们！

假若你觉得你的眼泪是流出来了，那么来听柏尔森司的最后的话：

到我的墓前不要带来你们的悲伤，
也不要带来眼泪和凄惶，
更不要带来憎恨和恐慌！
当我的嘴唇已经哑了时，
我不愿你们这样的来到我的墓场。

.....

不要用你们的怜悯来侮辱我的死灰，
要知道你们还留存在这荒凉的都城，
你们还要忍受着绝大的惨痛和苦辛。
只有我，只有我应该来怜悯你们！

.....

四十年前德国无政府党人奈柴尔 (R. Reitzel) 在殉道者墓前说的话是不错的。他的演说的结尾是：

“我们没有理由来哀悼死者，他们是死得极其勇敢的。而且像十字架曾是爱的象征一样，十九世纪的绞刑台也就是自由的象征了。但是我们应该来哀悼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羞耻悲，为我们的懦弱悲，为我们的迟疑寡断悲。”

我们离开这些坟墓时，大家记着赫尔威格的话，

“我们已经爱的够多了，
让我们开始来憎恨罢！”

安那祺主义文库目录

- A-1: 《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万塞蒂与沙珂著，巴金译著，ISBN: 978-0-557-16157-7
- A-2: 《一个安那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柏克曼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2-9
- A-3: 《芝加哥干草市场的殉难者》，赵京编著，ISBN: 978-0-557-24143-9
- A-4: 《美国政治的安那祺主义传统》，赵京著，ISBN: 978-1-257-43927-0
- B-1: 《政治正义论》，葛德文著，何慕李译，ISBN: 978-0-557-32714-0
- C-1: 《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赵京编辑，ISBN: 978-0-557-19209-0
- F-1: 《什么是所有权》，蒲鲁东著，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 G-1: 《德意志观念对安那祺主义的贡献》，赵京编著，ISBN: 978-1-257-37771-8
- J-1: 《日本政治论丛》，赵京译著，ISBN: 978-0-557-23538-4
- R-1: 《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6157-7
- R-2: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3-6
- R-3: 《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6-0
- R-4: 《俄罗斯革命的起源》，斯特普尼亚克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7-7
- R-5: 《一个革命者的狱中二十年》，妃格念尔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5-0
- R-6: 《鲜为人知的革命》，赵京编著 ISBN: 978-1-4583-0411-7
- R-7: 《俄罗斯革命的先驱》，巴金译著，ISBN: 978-0-557-22345-9
- S-1: 《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赵京编著，ISBN: 978-0-557-17055-5
- W-1: 《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赵京著，ISBN: 978-0-557-01635-8
- W-2: 《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赵京著，ISBN: 978-0-557-03086-6